

國家圖書館



001687434

創造社論

黃人影編



.908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籍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創造社論

黃人影編



1932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付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

1—2000



版權所有

本書實售大洋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二分半

820.908
858

創造社論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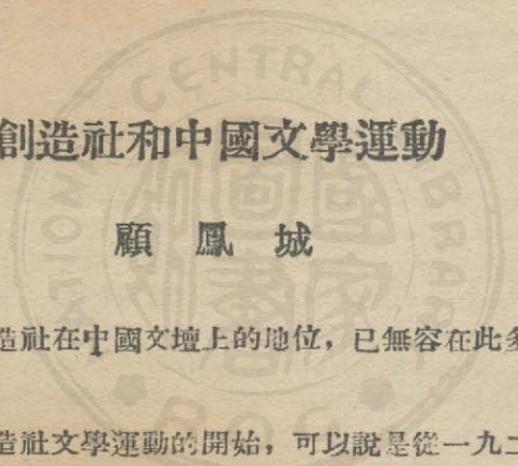
- 創造社和中國文學運動
創造社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眼
 曠“創造社”
創造社的自我批判
上海文藝之一瞥
“創造十年”發端
“眼中釘”
創造社訪問記
【附】創造社各作家略傳

國家圖書館



001687434





創造社和中國文學運動

顧鳳城

創造社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已無容在此多說了。

創造社文學運動的開始，可以說是從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創造季刊第一期出版的時候為始。那時創造社還無獨立的出版機關，後來才成立了創造社出版部，至一九二九年二月封閉，創造社的文學運動在中國是差不多有了十年長久的歷史。

無疑的，創造社和中國的文學運動其影響是很大的。他們的文學運動是在五四運動以後，那時候創造社的主要的構成份子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都一致主張于新文學的建設，他們批評粗製濫造的作品，抨擊不通的翻譯；不過，他們那時的思想，完全是個人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如在創造季刊，創造週報，以及初期的創造月刊等，都是主張個性的發展，內在的要求，熱情的奔放，自由的組織，這種意識，都是一種浪漫主義的運動。當時中國的社會，也是在新舊遞變之中，一般知識份子的青年，接受了外來資本主義的洗禮，正彷徨於國內的新舊思想的轉換之中，所以對於創造社的文學運動，當然表示熱烈的歡迎與擁護了。這是創造社文學運動的第一個階段。

五卅運動以後，郭沫若首先轉變了方向，創造社出版了洪水半月刊，打破了他的純文學的創製，注意到實際社會問題的探討了。郭沫若在洪水面發表了很多的社會問題的論文，繼而又在創造

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學與革命’，這是創造社正式提倡革命文學的第一聲。當時他們社會的基礎在那裏呢？中國的青年，因為受了五卅運動的激盪，他們的意識當然也日趨於革命化，加之感于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軍閥的壓迫，看見創造社在文學的分野上首先喊出‘革命’二個字來，當然是為整個的青年界所接受了。這時可以說是創造社的第二個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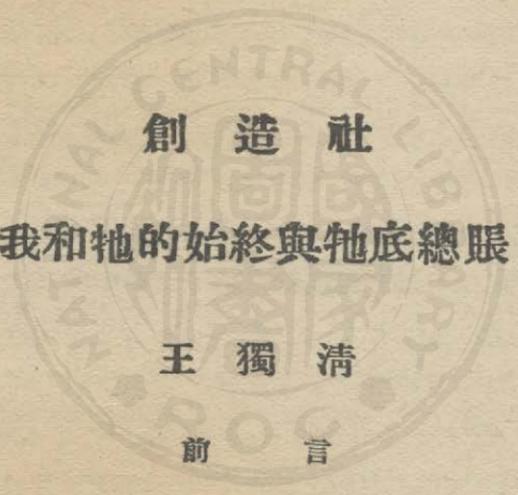
後來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郭沫若成仿吾等都參加實際工作去了，那時的創造社是由郁達夫主持，他在洪水上發表了在方向轉變的途中，王獨清也發表了‘與法國友人摩南書’等，都是對國民革命表示擁護的態度。不過後來他們的內部就起了分化的作用了，郁達夫首先脫離了創造社，而郭沫若也離開了政治生活，到日本去了。

中國的青年自從感到了對於革命的消滅以後，正彷徨於歧途，於是創造社在那時又轉變了方向，那時正當一九二八的年初，朱鏡我，彭康，李初

梨，馮乃超等新從日本回來，將快要沒落的創造社復興起來，出版文化批判，思想月刊，日出等刊物，將創造月刊也正式轉變方向，由王獨清主編，他們一方面是從事於科學的唯物論和社會主義的介紹，一方面喊出無產階級的文學來，對於中國的社會和文壇作一個整個的清算，這是創造社的第三個階段。

創造社是以個人主義浪漫主義的文學運動開始，以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而遭封閉。

無疑的，創造社是近十年來的中國文學運動的一個主潮。



創 造 社

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賬

王 獨 清

前 言

創造社是被封了，現在雖然表面上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但是牠過去在中國底文化史下無論如何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頁的。現在我們回顧牠底過去，給牠本身一個真正的評價，這是一件最有

意義的事體。不過這兒須要注意，必得客觀的眼光纔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常常看見每當一個比較有價值的團體或一種有歷史意義的運動一成為過去的時候，便會跳出一些英雄們在標榜自身對於該團體或運動的功績，以期爭得歷史上的光榮。創造社這個團體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們看，目前已經有許多的英雄們在作着這種工作，並且還有許多英雄們底雇傭者也在努力地篡改着歷史的事實。像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決不能給這個團體一個真正評價的。我覺得在這兒實在有把那些被一般英雄們及他們的雇傭者所掩蓋了的事實報告出來的必要。我個人總算是在創造社負重要的責任的一個人，現在我來把我親歷過的事實狠坦白地寫出，我覺得這是我底責任應盡的地方。要是容許我說句大膽的話時，或者我底直白的記錄可以作一部分將來的史料。這個，便是我來寫這篇文章的重要因數。

凡是信仰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歷史的

事實的。改竄歷史，那是資產階級卑劣的陰謀政策。我在這兒並不想用理論的分析作詳細的評價過去的工作，我只想借這篇文章把我個人和創造社發生關係後親歷的事實一件一件都公佈出來，我自己有錯誤的我當然自動地承認錯誤，別人底行為我也要毫不客氣地敍出。——對不起我過去的那幾位朋友！我在擁護歷史事實的這一種義務心之下不得不這樣作了！

好，下面便是正文。

創造社底活動誰也知道有三個時期：第一是“創造季刊”和“週報”的時期，第二是“創造月刊”與“洪水”的時期，第三是轉變方向後的“創造月刊”與“文化批判”（後改名“思想”）的時期。第一時期我參加很少，那時我在歐洲，僅僅因了鄭伯奇底介紹，發生了通信和寄文字的關係。——這兒，很像一個奇蹟：我從前在日本的時候並不會和郭沫

若，郁達夫等見面，而以後發生關係卻是由於一個在創造社內部一向最被人不信任並且不重要的鄭伯奇底介紹。並且創造社底前前後後凡是重要角色都是日本帝國大學底出身，而獨有我是一個例外。

雖然我很少參加，但因為給“創造季刊”的撰稿，和郭沫若的通信卻是不會間斷過。這第一時期底創造社，我們可以肯定牠是一種“浪漫運動”。牠底產生是在五四運動以後，五四運動不消說是資產階級底思想上的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底機關雜誌“新青年”把全盤的思想予以從新解放和建立以後，創造社底文學運動便在歷史的必然性之下應運而生了。當時歌德底介紹，雪萊底移譯，確是一個“風飈時代”(Sturm und Drang)。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歷史底發展，決不能用機械論去分析。創造社底開始崛起，自然是資產階級底文藝運動，但因為在中國，資本主義底逼來已經是在歐洲最高峯的發展以後，這就是說，無產

階級底隊伍已經在世界露出頭角來了。所以在中國不怕文藝上的浪漫運動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創造社開始活動的一年）纔行開始，但是終久不能產生像雨果，攏倫那種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作家。這是很明白的：作家纔要提起筆來創造像雨果攏倫等那種作品的時候，不料他底後背便來了無產階級底聲鼓。在這種情形之下，便會有一部分作家把他底作品轉變為小資產階級底形式，——不消說這是再進一步到革命文學的一個橋梁。在創造社內邊表示這路線最明顯的是郭沫若。李初梨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二期）一文中把我同穆木天馮乃超並列為後期底三個人，這在大體上自然是沒有甚麼錯誤，但是我卻是在浪漫運動中過了一下身的。我底作品一直到第二時期“創造月刊”時代還有不少浪漫諦克的成分，這卻為穆木天馮乃超所沒有。

創造社底開始不怕是一個浪漫運動，但是這在本身幾個原動力的人物卻都並不是有計劃的或

有意識的。郭沫若在“創造季刊”第二期底編輯餘談中明明自詡地說不管主義怎樣，只要是能創造出好的作品的人都可以攜手同行。當時這種“以形式決定內容”的文學主張確是創造社共同的傾向。因為是這樣，所以在那很少的幾個重要份子之中已經早蓄着各人有各人底前途的成分，所以後來的分化是特別的厲害，雖然這是社會起了變革的期間智識份子底必然現象。

二

創造社底第一時期，我因為沒有很多參加，所以許多歷史的事實是無從說起的。不過創造社第一時期末告終，據我看就是爲了那種浪漫運動再不能繼續下去的緣故。那時正是“五卅事件”底前夜，革命空氣底醞釀是一天加緊一天，無產階級底隊伍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個重要的勢力，在上海（不要忘記！上海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行使其壓迫的區域，是一切鬥爭首先顯露的區域。）幾個創

創造社底中空便感覺到了矛盾的苦悶。當時郁達夫住在北京，張資平住在廣東鄉間，所以都不曾有甚麼不安的表現，而在上海的郭沫若與成仿吾便因為這種矛盾的苦悶自動地把第一時期的運動告了結束。

創造社第二時期末復興決不是一回偶然的事體。這第二時期末開始是恰在“五卅”以後，我們且看當時幾個中堅份子底行動罷：郭沫若是第二次由日本回來，目擊了“五卅”的事變；成仿吾首先到了那時革命發動地的廣東；郁達夫也脫離了北京的生活；我那時爲了“五卅”竟然不願再在外國流浪而回到了中國。——這些不管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總之都是把這些份子逼到了接近實際和行動的道路上的證據。在“創造月刊”第一期出世的時候，恰是這幾個人連袂到廣東參加實際活動的時候，自然，“創造月刊”所登載的作品大部分還具有着舊的內容，但是比較“創造季刊”卻是進了一步：對於作品的精選，對於理論文字的注

重，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個人藝術底攻擊（何畏：“個人主義藝術底滅亡”），寫實主義底提倡（穆木天：“寫實主義文學論”）等等都是“創造季刊”時代所沒有的。不管那些主張有沒有錯誤，不管寫那些論文的人同時又在創作和自己主張極相反的創作（譬如穆木天一面寫“寫實主義文學論”的論文一面卻做着Sama-in與 Gourmont式的象徵詩歌），但是這些畸形的表現卻正是證明了這個集團努力新的方面傾向的事實。同時還出版了“洪水”半月刊，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表現。“洪水”這個刊物若僅僅在文學運動的意義上來說時，或者有人以為牠比不上第一時期附屬於“創造季刊”的“創造週報”，不過“洪水”底特點卻在另外的一種意義上：牠所登載的文字並不限於文學，一切政治，經濟的論文都一齊登載；並且牠是接近一般青年的公共會場，對於外邊的投稿幾乎十有八是不拒絕的；還有當時與國家主義的“醒獅”派和“獨立青年”派的論戰都由牠當

了先鋒，所以“洪水”雖然表面上是一個蕪雜而沒有系統的刊物，其實牠所發生的影響卻是異常的廣大，這是怎樣也不能夠否認的。

我們要是很客觀地來比較創造社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活動時，那我們可以說是創造社在社會上的基礎大部分是第二時期建立起來的。這並不是像創造社內部一向所解說的理由，說是因為這時出版部的成立，免去一般商人書賈底壓迫，——要是僅僅以這個為創造社這個時期底發展的理由時，那也不過是站在“營業競爭”方面，要是沒有一種思想來作核心，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面作這種“營業競爭”的活動是很平常的事體，怎樣也不會造出一種勢力出來的。創造社之所以能在第二時期造出一種勢力的原因便正在牠所能夠傾向到當時社會需要的思想方面。而那時幾個中心份子之奔赴廣東，愈使牠底傾向實踐化起來。到廣東後第一步在廣東大學文學院底革新運動便表示了創造社左傾的行動。當時在革命澎湃的廣東，所有左

傾的智識青年大都聚會在廣東大學底文科，所以創造社之主辦廣大文科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體，後來郭沫若是參加北伐，我主持文學院，一直到廣東底政治右傾纔算把那個使命放棄。

在這個時候，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很客觀地說明的：便是郁達夫底脫離創造社。

這一個事件，當時郁達夫曾在別種雜誌上做過幾篇很憤激的文章，一直到現在，還有人把這件事發表在文章中充實自己清算創造社過去的材料。現在還有人在文章中說郁達夫當時把創造社底職員潘漢年等趕走和他在“洪水”上發表的那篇“廣州事情”爲他反動的根據。這個，我不能不在這兒很客觀地講幾句公正話以明這事的真象。

我們應該首先承認，郁達夫這人是老早已經等於死了的，並且當時創造社之和他決裂，我便是主動者之一。但是當時創造社在上海的兩個中心份子——成仿吾和我——對郁達夫的不滿，只是爲了他負了社內編輯的重責，卻一年來只編了一

期月刊，一點工作都沒有進行。說老實話，當時創造社同人雖然是思想左傾，但是說到怎樣一個堅決的明瞭的意識卻是任何人都沒有的。譬如郁達夫和胡適周旋，當時固然同人都不滿意，但是那種不滿意僅僅是爲了自己團體中的人不應該去加入另一團體，這只是站在友誼上對郁達夫的一種責備，實實在在當時創造社內部誰也沒有一個明確的階級的立場。我們應該坦白地承認，創造社不怕過去的影響很大，但是終竟是一個智識份子底同人團體，一切幾乎都以這個團體本身爲出發點，胡適在當時固爲創造社所反對，但是沈雁冰很早便參加了前進的政黨，卻也爲創造社所反對，所以我們應該現在坦白地承認我們從前許多表現都是直覺的爲多，怎樣明確的意識卻是沒有。——我們要很虛心地承認了這點，纔能客觀地批評郁達夫底事件。

先說趕走創造社職員潘漢年等的那事件。創造社出版部底成立，無論如何，要算周全平底功

勞，因為當時一切奔走之勞全是由他擔任。周全平這人是一個很好的實際事務家，他對於創造社出版部的盡力，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當時創造社底中心人物都集中到廣東，出版部概由周全平負責，潘漢年等人都是由周全平招引到出版部作技術工作的。可是這時便發生了一個問題，便是在廣東底幾個中心人物和在上海出版部底所謂“小夥計”的隔阂。當時我在廣東，關於出版部中人底情形不大知道，可是在廣東的人都以為出版部底“小夥計”怠工，那時所引為中心的證據似乎是因為他們自己在出版部中出了一種小刊物；這個老實說，就是所謂“小夥計”底小組織的形成，惹起對於幾個上層份子底不利，所以非要設法解決不可。適逢這時在廣東大學文學院底使命已經告終，郁達夫首先要回上海，大家便公舉他去解決這個問題。郁達夫到了上海果然便依了這個決議，徹底同所謂“小夥計”分家。——這便是當時的事實。我們在這兒要明瞭的是郁達夫底這種行動實在是得了當時創造

社幾個中心人物底同意的。誰要說那時周全平潘漢年等是有革命的表現而郁達夫因為反革命便驅逐他們時，那只是過後的欺人之語。潘漢年在出版部翻印無聊的書籍，郭沫若還自動地說這樣非驅逐不可。以後發生了小組織的問題，成仿吾屢次罵周全平是“拆橋派”，這自然用的是“過河拆橋”的成語，意思是說周全平底“叛亂”。不消說我既是上層份子之一，這種意識自然我也是不能免掉，對於這問題的應該解決，當時我也是積極主張的一個人，總之這件事決不能放在郁達夫一人底身上，更不能因為潘漢年等目前的轉變，便故意把過去的事實顛倒。當時創造社無論是上層份子和所謂“小夥計”都是想把持出版部，這只是利害之爭，談不到甚麼革命與反革命。

同樣，我和成仿吾以後在上海又和郁達夫分家。也並不是革命的問題，郁達夫當時也曾做過幾篇似通非通的無產階級與文學的文字，在當時，創造社同人除了幾個人傾向實際方面和郁達夫不相

同而外，理論方面誰也談不到有相當的成熟，所以與郁達夫的決裂全是站在出版部底工作上。這正同第一步整個上層份子和所謂“小夥計”分家一樣，不過所謂“小夥計”底怠工，在當時上層份子以為是小組織的關係，郁達夫底怠工，完全是懶惰與浪漫所致。當時創造社同人除了郭沫若還在武漢而外，其餘都又回到上海，大家都想把創造社發展下去，對郁達夫底不進行工作自然要同聲地不滿，——自然，我們不能否認創造社這幾個中心人物內部一向的衝突。但是那些衝突都是小資產階級底脾氣，就是所謂“文人相輕”的惡習。這個或者也是當時幾個人和郁達夫分裂的成分之一。但是無論怎樣，我們不能把現在這件事塗改成一件好看的屍衣，來裝飾我們底過去。

其次，郁達夫在“洪水”上用化名發表的“廣州事情”，曾引起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底指摘，成仿吾還做過一篇駁這篇文字的文章也登在“洪水”，替郁達夫所反對的廣東政府辯護。這個我們現在

也用不着站在整個政治立場上來批評（因為用我們整個的政治立場來說時，那在很早以前已經應該反對了！），只就當時底情形而論，郁達夫所反對的正是廣東政治右傾後的政府。那時創造社底同人幾乎已不能在廣州立脚（廣東大學很高的牆上張貼的打倒我的標語大概現在還有的罷？），清黨的風雨已經漸漸地露了信息，郁達夫大概就是僅僅只憑了他底直覺纔回到上海後寫了那篇文字的。自然，要說根據那篇文字便說郁達夫有甚麼政治主張，那是胡說，因為郁達夫這人根本就是不懂政治的，但是當時因這個不滿郁達夫的人，那也是糊塗，若是再到現在還用這事作為張本時，那簡直是故意歪曲事實了。

郁達夫這人老早是已經等於死去了的，我們決不像魯迅，在所謂左翼作家底會席上說他底頹廢是可以原諒的，——聽說魯迅說了這句話以後，那般參加創造社底第二時期運動，並且曾經堅決地反對過魯迅和郁達夫的人竟都一致地鼓掌贊

同，第二天便邀請郁達夫參加所謂左翼作家的聯盟了。我們決不像這樣，我們始終應該承認：郁達夫是無可原諒的。我以上所說，只是爲明過去的事實，並不是替郁達夫充當律師。郁達夫底自甘墮落，誰也不能替他辯護。

還有郁達夫做小說罵我的一件事，現在也還有人做文章提起，這個，正同張資平和一位名爲楊騷的作家做小說罵我一樣，都是以個人底利害爲出發點的（張也是後來因爲同創造社決裂，楊則是爲我沒有接收他底投稿。），那種無意識的舉動，實在沒有詳細分析的必要，在這兒也再不必論列下去了。

三

這兒我應該對我個人作一番清算。

創造社底第二時期，可以說是由我結束的。我過去的傾向是經過浪漫譁克而轉成狄卡丹的，不消說我過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與頹廢的氛圍

裏面。我自己應該很坦白地自承：不怕過去我也曾常常願意接近政治，但是我底行爲有時總露着有“放浪文人”（Bohème）的氣分。我在廣東時的左傾完全是直覺的作用，同時是團體推動的結果；及至清黨事件發生纔算把我底意識漸漸地喚醒了起來，可是那個只根據於一時感情而來的意識是很靠不住的，我曾因此陷入了一個非常苦悶的狀態，並且更增加了我作品上的傷感。

在這個時候，“創造月刊”是由我擔任編輯，我本身底矛盾狀態也就反映在刊物上邊。第一卷第八至第十各期的“創造月刊”實是代表創造社轉變的過渡期：成仿吾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論文已經發表（雖然那些論文在現在看去是有可議的地方），而同時穆木天底沒有批判性的“維勒得拉克（Ch. Vildrac）的介紹”還占着很多的篇幅，——這現象曾成當時反對創造社的人們底口實，不消說，這是應當由我負責的。這個，怎樣也再不能發展下去，說老實點，便是那樣的編輯，我再

擔任不下去了。適逢那時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這般創造社後期的人物都由日本回國，事實上要組織編輯委員會進行一切事務，“創造月刊”便交給了編輯委員會去另訂編輯的方針。

這樣，創造社底第二時期便由我告了結束。

以下我們要說創造社第三時期的運動了。但是在未曾敘述以前，我們須先明白當時中國底社會背景。

震動世界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失敗了以後，一個可怕的瘟疫降到地上來了：逮捕與屠殺布滿了全國，革命份子底犧牲幾乎成了每小時必然的現象，整個的空氣變得異常的恐慌，在這種情形之下，必然地要產生對於過去失敗原因檢討的工作。——不消說要真正能夠負起這工作的必須是參加過去革命的人，並且還要真正明瞭領導這次革命的無產政黨底許多內部事實。不過這個在當時中國可以說是一種理想，在國際間底封鎖和中國一般政治水平過低的環境中怎樣也不會

有那種真正檢討的工作，誰也不會想到過去的失敗是最高國際本身領導的錯誤，誰也不會指摘出國際斯達林底曲線的政治。但是不怕事實是這樣而一般前進的智識份子卻常常露出了想了解過去革命的企圖。不過想達到這個企圖，第一步須先要研究基本的理論，——理論！這樣一來，一切都非給一個全部的批判不可。文學，藝術，都得從新來過！這樣，一個新的文化運動便不能不應運而生了。

說起來可憐得很！創造社第三時期底運動實在是產生在對於過去革命失敗的檢討的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批判”第一期上成仿吾底“祝詞”首先引用了那句不朽的格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便是一個露着這種企圖的明證。可是不料創造社底工作僅僅作到社會科學理論一般地介紹和馬克西斯姆底基礎智識在智識青年中的普遍化，僅僅作了這樣第一步的工作並且還沒有作得充分，便受了當局底摧殘，驟然地中止了。同時在中國斯達林派底組織力量底領導之下，使

創造社第三時期文化運動的主要份子竟離開這次運動的根本意義，這就是說：這般份子放棄了主要的第二步工作，只停頓在第一步工作的階段上再不肯前進，不但不作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工作，並且還做了掩護過去失敗的斯達林派底代言人了。說起來真令人痛心！創造社前期底中堅份子，墮落的墮落，不動的不動，而後期的幾個真有希望的幹才也再不求更進一步的發展：自己本是為擁護真理而來，卻因為不能把握到深刻的政治意識，徹底去達自己底願望，結果只能在第一綫上盤旋而不能擁護真理的中心點，甚至，還成了真理中心點的破壞者。——創造社，便在這種不斷急退的浪潮底重圍之下淹沒了牠底存在。現在，算是只剩到我一個人，在突出這種重圍。

關於這第三時期，有許多內部底事實應該公佈。

很客觀地說，第三時期底開始，成仿吾是有功勞的：當時他擔任創造社出版部事務方面的職務，

而李初梨等一般後期的新進份子都是由他招致到上海來的。不過這兒成仿吾卻作出了一點很不好的工作，便是他故意把後期底份子和前期末份子劃了一道界限。他向李初梨等再三地說郭沫若和這些人是既成作家，表示轉變新的方向底困難，並且有時還宣明地說新的份子底加入了創造社，等於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但是在我和郭沫若面前卻說這般新份子將另有作用，將來若是他們要把持創造社時便叫他們“滾蛋”（的確確是用了這兩個字的），——這種使團體分裂的行動，或者也並不是出於他底惡意，不過這個的確是使雙方隔阕了很短的時間。打破這個隔阕的局面，便是我底徹底轉變方向的態度。

前面已經說了，在我把創造社第二時期告了結束的時候，我是完全陷在了一個苦悶的狀態裏。在社會變革的期間，文學家底藝術的苦悶，決不是沒有親自嘗過這滋味的人所能夠了解的。絕大的難關便是自己要把自己過去心血的創造予以揚棄

(Aufheben)，這決不是一回容易的事體！許許多多的文學家底自殺都是因為跳不過這一難關的原因，然而我算好，算是當時終在努力之中轉變過來了。這個使創造社一旦統一了起來，新的工作遂從新開始。

這時郭沫若到日本去了，成仿吾也遠渡重洋去度巴黎的生活。在上海還有一個張資平，算是第一時期的底人物，而就是爲了這一位人物，我同郭沫若爭持，辯論，以至決裂。

創造社一向幾個中心份子都有一種傾向，便是對於新進份子加入的防制，表面上雖然是取着公開的態度，其實卻總是無形地維持着原來的幾個中心份子底小組織的。自然，這種傾向假使是以政治爲出發點的時候，那還是必要的事體，但是創造社過去卻完全是以這個團體底本身——甚至是以個人爲出發點的。張資平始終不能同李初梨等相融洽的就是這個習慣底作梗。不消說要打破這種習慣，就在一個前提的政治的認識而能切實地

轉變方向，但是張資平這人是不會轉變方向的，這樣，所以當時弄得起了許多糾紛。有一次爲了出版部經濟公開的問題，全體都不滿張資平底行動：他在會場中本已服從了全體經濟公開的決議，而散會後卻又否認這件事情，並且自動地和創造社底一切事務隔離。當到全體認定了不能因爲一個人底行動而妨礙整個的工作，無形中依了他自動的意旨，算是解放了他個人全體仍繼續着工作的時候，郭沫若給我連二連三的質問的信來了。在那些信中郭沫若是露出了許多的盛氣，又不斷替張資平辯護，說他是很可以做同志的，又不斷地要我監視李初梨，馮乃超等底行動，說是他們要破壞創造社底前途。實在說，在過去創造社底同人中，除了成仿吾和郭沫若是在特別歷史上個人間的關係很深而外，要算我同郭沫若最接近的。過去我和他底友誼是站在同調（過去是談不到甚麼同志的）與所謂知己上邊，因此，我比較知道他底性情，他是往往受着別人底包圍而不自覺的。當時我曾詳細

爲他解釋，總想把他對個人的意識移到整個工作方面去。但是不料我底計劃失敗，他連二連三地不了解，使我最後取了比較堅決的態度，我表示了創造社後期新進份子底純潔爲前期份子所不及，我指摘他對他們的懷疑是非常不正當的。這樣，我便同郭沫若個人間起了裂痕，便再沒有通信。

現在呢？郭沫若聽說已與可認爲同志的張資平決裂，而對於所謂應該監視行動的李初梨一般人又成了很好的同志。那麼對於我呢？是不是認爲我從前的話是正當的呢？——不，“總之大家合起來不提，不提，第三個不提！不管怎樣，王獨清始終是錯誤的！”

對於創造社第三時期內部的事件也再不必煩瑣地敘述了，現在我們還是來回顧一下這第三時期末工作罷。

不怕我們承認這第三時期末工作只做了第一步，並且第一步工作還不曾做得充分，但是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時期工作成績底偉大。——這並

不是因為這時期我自己是個主要負責任的人，所以便來誇大這事實，實實在在是在中國底文化運動，“新青年”以後，便要算創造社這個時期底文化運動是最偉大的了。一直到現在，雖然還有人不把這時期底運動作為十分重要的看待，但是這不是成見便是不明瞭事實！這時期底運動第一便是對於“布爾喬亞派”底“意德沃羅基”予以根本地批判，其次是建立起“普勞列搭利亞”底人生觀與世界觀。——自然，我們決不否認，這種工作在以前中國是有人作過的，但是無論如何，像這次這樣全部的批判和在一般文化上顯明地提出新的口號樹起新的基礎的卻是還沒有過。這次工作成績底具體表現便是：社會科學書籍普遍地流行，普勞列搭利亞革命文藝占領了文壇首位。只是這兩點，這次的運動已經表示了牠底重要了。

這次把“創造月刊”完全轉變成一個為普勞列搭利亞革命鬥爭的刊物，我在這轉變的第一期（第二卷第一期）卷頭語上提出“不是解剖刀而是

武器”的文藝創作的信條，馮乃超在第一篇論文中間對於“新月派”底梁實秋給了深刻的批判。從此“創造月刊”成了全國新興文藝的中心雜誌。

同時“文化批判”底出版，在這時期是特別的重要，這是個一般文化理論的刊物，在這上面曾登載許多劃分時代的論文（李初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彭康：“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底總結算，”等）及許多基本理論的介紹，在青年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來因為被當局禁止，遂改名“思想”，一直刊行到創造社被封，纔跟着“創造月刊”底命運敲了葬鐘。

叢書方面，刊行了創造社從來沒有刊行過——老實說，以前中國整個出版界也沒有這樣有系統計劃地刊行過——的社會科學叢書，文藝方面雖然多是在刊物上發表，叢書中新的作品比較的稀少，但是誰也不能否認當時努力的情形，像我底“11 Dec.”（這是魯迅在“未名”半月刊上驚駭地認為“為電影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的

作品)底出版便是一個明證。

但是這個時期的創造社卻決不是只抱着文字工作的，並且同時還從事於實際的教育工作：這便是上海藝術大學因我底主持教務，全體一致地參加 這個活動的成績是教育了無數的革命青年。一直到現在，前進政黨中的許多青年幹部份子都是由這兒出身的。

回顧這次運動，幾個動力的份子，我們應該提出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李鐵聲，沈起予諸人。一向“學藝好玩家”(Dilettante)兼“消遣文筆者”(Amateur)的鄭伯奇也湊熱鬧地加入這個運動。

當時隨着創造社而產生的刊物幾至多不勝舉，現在能想起的有“太陽”，“我們”，“洪荒”，“戰線”，“澎湃”，“摩洛”等等。創造社除了本身主要的刊物而外，還附出了許多小的刊物，如“流沙”，“畸形”“日出”等等。——這些刊物，自然有些不大成熟的，但是我們據此可以看出當時底一種努力，算

是到了創造社被封，這種勢力遂突然地低落了下去。

創造社被封的時間是一九二九年一月，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血的紀念”！

四

創造社第三時期在文藝界上有一個事件，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便是反對魯迅的事件，這事一直到现在還有人不知道其中的內容，以為當時創造社是有意逼魯迅反動的。其實事實決不是這樣。這事發源於創造社底一篇論文，是對於中國文藝界整個的批評，連創造社底同人都一起在內；可是就是這個，惹起了魯迅底虛榮的脾氣。他在挑字挑句地說那篇文字中有“醉眼陶然”的四字是因為他是生長在出酒的紹興，所以故意罵他。這個，只有魯迅那種腦筋纔可以想出，這要不是他以後說出時，當時連我也還不知道他是紹興人的。就是這樣纔惹起了一場論戰，當時凡是意識明瞭的人都莫不

認爲魯迅那種不接受批評的態度是應該反對，那時雖然有些文字流於漫罵，是不很正當，但是這一場論戰底結果，卻是在青年面前打破了具有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的文家學底偶像，而使新興文藝的戰線加緊起來。

說到這兒，我們不能不退到前面所說的話上去。創造社雖然在第三時期底成績很是巨觀，但是牠所做的工作卻是只做了第一步便告了中止，我們可以說牠只是演了一齣“前奏”（praludien）以後便失掉了下文。這在產生這個運動的本來意義上來說，實在是一個不幸。那般動力的份子竟都丟棄了他們下半部也就是重要的一部的工作而再不繼續地發展下去。就是說，用第一步所發揚的基本方法（唯物的辯證法）再對於中國底現實予以積極地分析，建起實踐的指導理論。——這便是這個運動產生的本來意義，也就是這個運動底最後目的。這個，首先的任務便是要對於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予以嚴格的檢討。但是可惜作這第一步工

作的大部分的人卻在斯達林派底領導之下沒有作下去的可能(過去政治文件的封鎖和整個掩護過去錯誤的路線的阻礙),並且,還要作出一些適相反對的工作。

因為一走上了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以後來的工作形式都成了曲線的表演了。所以反對魯迅郁達夫的人現在又去自動地同魯迅郁達夫聯合!——自然,作這種工作的人是借口於“策略”兩個字的,但是這給一般青年的影響是甚麼呢?是自己混亂了戰線,是給不健全的文人擴充了市場(注意!魯迅等之所以相當接受這個聯合的也就爲的是市場)。真的魯迅郁達夫轉變方向了嗎?聽說郁達夫被請到某處講演,表示他對當局不滿,主要的是爲了因爲生活高漲使他沒有煙吸和沒有酒噓;魯迅一面同聯合他的人敷衍,一面在雜誌上不斷地罵聯合他的人(見“萌芽月刊”),並且還帶着許多的嘲笑和惡意。但是我們去聯合魯迅和郁達夫的人怎樣呢?郁達夫底那種表示是只有認爲

正確，魯迅底惡罵是只有置之不答了)聽說在一次會議席上，有一個人提出魯迅態度的問題，負聯合工作重責的潘漢年回答說：“因為魯迅要試驗我們年青人之能不能忍耐的緣故。”真不成話!)。當創造社批判魯迅的時候，朱鏡我在“文化批判”第三期編輯餘談中說魯迅“似是而非的議論，不但混淆聽聞，而且還是一部分自鳴得意的智識階級底思想之典型”，現在朱鏡我已是聯合魯迅者之一，這話當然可以取消，不過，我們真沒有發現“萌芽月刊”上魯迅底文章曾經跳出“似是而非”的圈子以外。

但是我們不能說李初梨一般人起初沒有作第二步工作的願望。據我所知道的，他們對於過去革命本都是非常注意。李初梨並且還對我屢次在他所能夠明白的範圍以內批評斯達林底錯誤，並且還批評到中國斯達林底許多機會主義表現最露骨的個人。可是那種願望雖是有過，結果他們卻是不能夠達那種願望。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斯達林派領導的罪惡!文化工作上的那種混亂戰線，正是托洛

茲基所說的“政治的神經病”的部分的表現，完全是在一個機會主義之下維持着局面的。處於這種的局面，不消說有過那種願望的人怕也要漸漸地遺忘，像李初梨對我批評斯達林派每個人的話，也都成了他“自見原形”（Doppelgangeri）的表露了。

好，我們現在給創造社一個總評。

創造社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重大的。牠擔負了好幾個時代的任務。牠底開始本只是以文藝為主體，最後卻擴大到一般文化的建設。牠之所以能造成一種勢力的是因為牠在每個時代都不脫離鬥爭。牠出版了許多刊物，許多書籍。文學作品底內容上形式上都給了文學界留下不少的影響。理論，批評，介紹，翻譯，牠都擔負了前驅的責任。

並且不止是這樣，創造社除了全國間接受影響的不知數的青年而外，還有直接教育出來的人才。牠第一次的參加廣東大學，牠二次的參加上海

藝大，造出了許許多多左傾的青年。至於創造社本身，很明顯的，連過去出版部底職員，像潘漢年，邱韻鐸等人雖然現在是在斯達林派底機會主義領導之下，但總都是參加了前進的政黨，作了實際的活動了。

現在，創造社雖然被封，可是牠所播下的種子卻是儘管在繁殖着。我可以在這兒預言，等到中國第三次偉大的火災來臨時，這些創造社底種子都要成爲那火焰中的燃料，會幫助那火光底擴大，幫助那火光蜿蜒。——創造社是不死的！

結 論

聽說不久以前在所謂左翼作家聯盟底某種雜誌的計劃會上，錢杏村曾提議“對於王獨清，最好以後不提”。——這是甚麼意義呢？因爲一提到我，便要提到許多歷史事實。現在正是在互相包庇過失，委曲改竄歷史事實的時候，當然是“最好以後不提”。

可是現在我自己來“提”了。我相信我以上所說都是非常客觀，除了懷了資產階級底卑污政策鬼胎的人總不會對我這個敘述表示不滿。我來再重說一句：凡是信仰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歷史的事實的。

我知道我底缺點，我是一切都愛講實話，不會掩護，不會曲改事實，這或者就是我不斷地失敗和受罰的原因。現在我又來發揮我底缺點，把創造社許多內部底事實都直白地曝露在這兒了。從前盧梭在他“懺悔錄”底結尾曾說道：

“我是說的實話：若有人對我這放了許多證據的敘述還以為不對，那他便是謊騙，若有人在我還生存的時候不肯討論以解決他不明白之點，那他便是不愛公理與真實”。

我借用這段話來告訴看我這篇文章的人。

九月，一九三〇。

A large, faint circular stamp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The tex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arranged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stamp, and there is a central emblem.

讀“創造社”

張資平

——給王獨清漏了幾件歷史的事實的補遺。——給
王獨清改竄了的幾項歷史事實的訂正。

昨夜和幾位友人外出散步，在書店偶翻閱“展開”第三期，發見有王獨清的“創造社”一篇。於是化了半個鐘頭把這篇王獨清自信為完全是實話的“創造社”讀下去了。不幸的是，我在這篇內發見了有許多給王獨清遺漏及改竄的史實，今特為之補遺並訂正如下

我覺得王獨清的那篇文章除了一部分須待我之來補訂之外，都是廢話，其甚者，王獨清對事件經過，不根據經濟的關係去分析解剖，而只寫了許多似唯心的論調，把他寫成像煞一個創造社的領袖，更進而誇大地說，第三期的創造社是由他統一起來，開始了新的工作的。那不單使我會嘖飯，即令給他統一起來了的分子，馮李彭朱諸人讀後，也會哈哈大笑吧。但這些是我不欲討論的。我想要說的話是在後面。

王獨清把我放在創造社的第一期人物裏面，這未免太客氣了，其實我當第一期（假定照王獨清的分期法）的人物的資格還不夠呢。當民十在東京第二改盛館郁達夫的房子裏開“創造季刊”及“創造叢書”編輯會時，我只承認應擔負的稿件外，一切都信任達夫和沫若，其次是民十一年五月，由東京回粵，帶了幾篇短篇小說稿件，送到福崗給沫若審查一下，後至上海即交給泰東書局。我便回廣東鄉間採礦去了。一直到民國十七年春三月由

武昌到上海時為止，我對於創造社事務都沒有過問，我不願意過問。故我最多只是一個創造社的準第一期的人物。

我因為負擔太重。（不單小孩子太多，並且須負擔親戚族人的一部分生活費）弄得我精神十分頹喪，對於一切積極的事情抱悲觀，並且也覺得自己實在凡庸，不會有什麼能力，所以常對沫若仿吾說了許多消極悲觀的話。仿吾屢次罵我“妄自菲薄”，“自己評價過低。”我還和他說笑：“我只有四兩的價值，那能夠自去騙人是半斤呢。”

沫若也有幾句話寫給我，我認為是十分中肯的。即他於民國十八年春，給我的一封信裏面說：

“……………我可以說一句開誠布公的話：我們都是因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們是單身，無論怎樣衝，我們都衝得來的，而且不僅是在口頭，不過我們儘管不能作怎樣轟轟烈烈的活動，我們的志趣操守總是在確的……………”

的確，如照王獨清所說的第一期的人物中，除我和沫若各有小孩四人之外，仿吾，獨清，伯奇，都是獨身者。沫若如何，非我所知。我在武昌住了三年餘，實在受生活的壓迫太苦了。到上海來後，看見社友各人的生活都比我好。查出版部欠我的版稅，竟達三千元之多，而各社友向出版部支過的錢，沒有一個人比我少的。本來這些都是關於私人生活的問題，可以不提。不過與後來整理簿記之事有關，不能不略為提及而已。

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才知道出版部內容之糟，仿吾只掛總經理之虛名，事務異常弛緩。故我對於出版部，更不敢過問，只和仿吾約了一個條件，每月給我八十元的生活費，不足之數，由我自己向他方面活動。恰好這時候有一個廣東友人，約我到“新宇宙”當編輯，我便答應了。

我進了新宇宙，更不常到創造社去了。但是仿吾每天到我家裏來，要我振作起精神來幹社的事務。不過我總是提不起興趣來幹。仿吾便疑我和乃

超，初梨等不能融洽。這其實我到上海來後，很早就跟着仿吾去拜訪過子勃，鐵聲，初梨諸人。我後來也和鏡我乃超會過面。他們給我的印象都很好。與他們相形之下，我更覺得自慚老朽。

獨清是我到上海初會面的。誠如沫若所說。他是個感情家。他向我所談的，話都是極其有趣而痛快。最初給我的印象也是極好的。他帶來我家裏談，也曾和我一同去上館子喝茶，進戲院看電影。

仿吾每次來，都是長吁短歎，像有許多話要說不能說出口般的。他那樣的神氣，非常可笑，我有時多方地去揶揄他，他便罵我太不莊重。

和獨清交遊了一個多月，我才知道他常是在担心仿吾會和馮，李，彭，朱諸人聯合起來，把他送入冷宮，他又告訴我，在我未到上海來以前，乃超，鏡我，初梨等如何地批評我，如何地罵我。我便說：

“我和他們見面好幾次了，一切誤解都消融了。我和他們是新認識的，本來沒有大不了的誤解。最多，只是爲我那幾本小說的問題吧。若以爲

是不革命的時，把紙版燒燬了就完事了。”

獨清還告訴我，鏡我當他的面罵過去創造社有這長的歷史却沒有養成出半個作家來。我聽見也只是一笑置之。

總之，我終不為獨清所動去反對馮、李、彭、朱諸人而使仿吾陷於困難的地位。於是獨清更對我批評仿吾做事如何之專斷。當然，我有時也會幫着他批評仿吾的缺點，即仿吾常重形式而不顧事實。獨清又對我說：

“他們遲早是要排斥我們的。他們（指馮李朱等）先要打倒你，其次打倒我，最後打倒仿吾。”

接着又罵仿吾之無自覺。我因為仿吾只罵我不積極做事，而不顧我的生活之困難，（我在新宇宙的薪額仍不能照數實支）於是我也陪他發了幾句牢騷。

“假定他們排斥我們，我們也樂得退社。但是版稅是要清算的。我們不可以再組織一個社，一個會麼？”

獨清以爲“創造社”有相當的歷史，不能完全捨去。我便說：

“我們組織一個創造新社不可以麼？最好再請達夫回來一同幹。”

獨清贊成最後一步，組織創造新社。（當然他是無此勇氣的，因爲他的性懶根本上沒有半點創造能力。無論在什麼時候，只有坐享他人的成果。這是我對他的批評。）但他不贊成再與達夫合作。後來才知道達夫在“北新”上做小說罵過他。

第二天仿吾盛氣地跑來責備我，不該把自己的不滿隱着不說，而教唆獨清破壞我們千辛萬苦創造起來的“創造社。”我一時摸不着頭緒。後來才知道獨清把我昨天所發的牢騷及說起組織創造新社之事，通告仿吾了。但我當時一點不怪獨清的反動，反感到有點痛快。於是我對仿吾又發了一陣脾氣，責備他對獨清的確太冷淡了。仿吾便告訴我：

“獨清一點不努力。近來因對新進者抱不滿

——尤其是對朱鏡我，——竟消極的連月刊也不編了。只好我自己來編了。他每天只是查看由外面的青年有多少恭維他的信寄來，他每天都是忙作覆這類的信。……”

當然仿吾也是在譏諷我。我們又一同走到獨清家裏來，要他出來同到東亞小館子裏吃晚飯。這當然是仿吾做東。往後有許久的期間，我們表面上是安靜下去了。

但是獨清無論如何不能原諒仿吾，事事都要和他抬槓。而我又因為生活關係，趕替商務印書館譯海洋學。對於創造社事仍然很冷淡。仿吾對於我們兩人的態度，似極痛心。因為他為人忠厚。又以鬧停我們和李朱馮彭之間的合作自任。今不見圓滿的結果，當然有些消極。因有出國之表示。很奇怪的却是仿吾表示下台之後，獨清對他的態度突地轉變好些了。嗣後我們三人又常常相聚談話了，有一次我們無意中談論到李，馮，彭，朱之有小組織，難保他們今後不篡奪創造社。仿吾的意思是：

“我們務必化除成見，努力研究，對新進者常保持指導的責任。（仿吾的缺點即在此點，但是可嘉的缺點。）我們若努力前進，他們仍想拆我們的台，這只好叫他們滾蛋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仿吾是拙於措詞的人，據獨清自己，說仿吾在廣大教課時曾當堂罵學生“混蛋”。但這是仿吾的率直，我們不能加以惡意的解說，獨清“創造社”這篇文章中，對“滾蛋”兩字，特加引用號下面又還加括弧說：“的的確確是用了這兩字的。”由此觀之，獨清之愛用挑撥離間的手段至現在還沒有改變。我想他對於“滾蛋”二字那樣用勁去解釋，適足以使讀者懷疑那篇文章除“滾蛋”二字以外，是不十分的的確確的了。在我則以為仿吾之慣說“滾蛋”二字，只能作“走開去”的解釋，因為仿吾臨動身赴歐的前夜，也曾說出叫我和獨清“滾蛋”過來。這不能加以怎樣深刻的註釋的。關於此段趣史，以後再述吧。

……記得有一次創造社和太陽社開聯席會議，我

本不願出席，仿吾定要我去，我便去旁聽了一個多鐘頭。問題是太陽社罵創造社的作家只會抄書不知行動。（大意如此）對太陽社態度最憤慨的是朱鏡我，而錢杏村則大罵他們抄書的主犯，我當時只發表了一句話：

“罵人抄書也可以。但切不可空空洞洞地罵，最好提出真實的證據來。”

我因為帶了小女兒來出席。給她鬧昏了，中途確退了席。我抱着小女兒臨走時，沒有把會議室的門關好，這是我的錯誤。但隨後聽見那門扉碰地一響關回去了。我對此事沒有半點芥蒂的，也不當它是一回事。第二天獨清又走來告訴我昨天我出去時沒有把門關好，馮乃超恨恨地伸出隻腳踢那扇門，關回去了。但我不相信獨清的話了。

其次有一天開編輯會，又談到理論與行動的問題。我是不甚了解的。不過我曾發表了一點意見，即是不能徒講理論，要理論和行動雙方並重。仿吾以為我訴說錯了，有幾次不准我發言。我便不

說了，心裏很覺好笑。此次獨清沒有出席。他因反對仿吾的專斷，常有這樣消極的態度。

第二天獨清又來向我說，仿吾罵你什麼都不懂，又愛說話。不過他們新進，對你還客氣，沒當場駁倒你。但是我想，我昨天就沒有說什麼話，值得他人來駁倒我的。我當時也因忙於翻譯“壓迫”，再管不到那些閒事了。

又有一次開月刊編輯會，仿吾把獨清拉來了。但在會場中我和獨清都沒有話說，由馮乃超主席。馮說了一陣廣東腔的正音後，仿吾便問大家聽懂了沒有。大概他還沒有聽懂。我想仿吾那樣不客氣的態度，不使乃超難為情麼？於是我反駁仿吾：

“他的普通話比你的新化的土話好懂得多呢。”

獨清聽見大稱快，仿吾反有點不好意思了。關於文藝理論，初梨發表最多。我不能一一記着。我只聽得他說：

“今後寫創作，應當是使它成爲馬克斯主義通

俗教科書。”(大意如此)

我當時覺得這個定義似有斟酌的必要。但自己沒有相當的研究，不敢再出來說什麼話了，只是緘默而已。

宣布散會後，我就要走，獨清留我再坐一刻再走。我說我忙，不能不走。獨清和他們說話不來，只好和我一同先出來。但走到弄堂口，獨清忽然要我一同再回去看看他們在討論些什麼事。我覺得獨清太可憐了，於是我說：

“何苦呢？”

“他們一定在批評我們。”

“你在那邊守着他們一回，就可以保證他們往後無機會說我們的閒話了麼？”

獨清沉吟了一會。我看他真是太苦了。過了一忽，他說：

“那我一個人回去再看看他們。”

“也好，聽見有什麼新奇的話，明天告訴我啊。”

我笑着和他告別。

第二天，獨清又到我家裏來了。他說，他們不走，是因為要向仿吾支錢用，迫得仿吾沒有辦法，下了幾張支條給他的姪子。獨清說了後還哈哈地大笑。

獨清是這樣Sensitive的一個人。

—

以上所述，並不是批評獨清個人，而只是在檢舉他對於創造社所論之有偏而已。獨清的性情有時是脫落不拘慷慨淋漓，但有時又胸地狹隘常因友人的“無心之言”而挹鬱不快者數日。在先，對於仿吾有所誤解，必欲去之；在後，對於我亦有所誤解而聯合李、朱、馮、鄭諸人，破壞創造社出版部（不是創造社，而只是一個營業機關。）規則，而反對我之整理出版部的計劃，亦是由於他之胸地狹隘妄猜疑他人而以“甯我負人毋人負我”為得意，我以誠待他，而他反來暗算我，其實這樣的暗算，真不值我之一笑。

仿吾既決意出國，但他並不是如獨清所想像是個不聰明的人。他明知道創造社出版部事情既如亂絲，而創造社的份子亦極複雜，難於統一。由失望而絕望，故決意出國，免日後負一切責任。他不會像獨清那樣笨，希望在某一期作統一的領袖。獨清曾對我說：“仿吾懂得什麼！不但了解社會科學，即文學理論又何嘗知道。他只想利用彭，李，馮，朱寫文章；他自己却在篇首寫幾句開場白，而高踞他們之上，作革命文學的領袖。……”（大意如此）人們都是明以責人，闇於責己的。不料仿吾走後，獨清又蹈了仿吾的覆轍。（假如獨清對仿吾的猜想是真的說話。）

有一天晚上仿吾約我同到大馬路天發池去洗澡，並要求我在他走後須出來負經理出版部之責。我才到上海來就真覺着創造社出版部之前途無望，當然不願意負責，故我力謝不敏，並推舉獨清，因為獨清對於出版部情形無論怎樣，比我熟悉些。仿吾的意思是牠並不是不贊成獨清幹，因為獨清

性質太脫落，對於事務之整理怕不適宜。我又舉伯奇，仿吾忙搖首。我問何故。他說，伯奇難靠。但我無論怎樣不願個人負責。因又提出彭康。我是十分佩服彭君的。此君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唯他易受虛榮心最重的馮，朱，李諸人包圍。仿吾大概也有見及此，故說他資格尚淺。（指與創造社的關係，但此係仿吾的錯誤。）最後我才提出從理事會舉出三人為常務理事管出版部的辦法，仿吾則說待去信商之沫若。

沫若不知道仿吾的苦衷，聽見我的報告時（即行常務理事制後），尚不十分贊成仿吾放棄出版部事務，寫了一封信來給仿吾。信到時仿吾已赴日本去了。仿吾曾囑我，沫若處到期即須寄生活費去，有信可以代拆。據這封信，我知道沫若是最贊成由仿吾負一切責任的。——否，大概社友中只有王鄭二人贊成仿吾“滾蛋”吧。沫若信中的一段是：

“……什麼緣故啊？最近張資平君來信說，社務由張君和王君負責了。（我報告是王

張鄭三人。洙若這信是用日本文寫的，大概是怕文句太長，口調不順，把鄭君省略了。)這真是完全如墮五里霧中。什麼緣故啊!……”

但是後來仿吾到了日本，把一切情形告訴了他。從前由仿吾經手寄生活費給他的，現在只好由我來盡義務了。其實也只是催收支系的人按期寄款而已。

所謂常務理事亦如仿吾之當經理，徒掛空銜，因為一切事務還是由成紹宗負責辦去。伯奇常來說，出版部的事務要整理，尤其是會計。我當然不反對，但對於解除成紹宗職務一層未十分同意。因為仿吾才出國未久，即除去紹宗的職務對仿吾的面子上不好看。我是和仿吾相信他的姪兒一樣相信紹宗的。我素來主張是，相信人要相信到底。至於被相信者之倒戈或無信，那是被相信者的無人格。從前仿吾和達夫提出周全平的問題來時，我是如此主張，後來對紹宗，仍不變我的主張。不過我沒有拿出十二分的精神來整理出版部，雖然說是

在新宇宙及其他方面事務太忙，但是仍不能辭避懶怕事的罪。我是承認這個錯誤的。

不過社中諸位都想做好人，要由我一人先發難去得罪紹宗，縱今有人罵我只會獨善其身，我也是不能幹的。紹宗對獨清特別好，獨清向他要款，即叫即應，故獨清當然也不願意提出清理會計之事。有一次我們三人——王、鄭、張——在麥拿里四一號二樓會同出版部小夥計，——即職員們，如成紹宗、邱韻鐸、梁預人等——開了一次常務會議，分配職務，結果還是紹宗掌收支。伯奇似欲有所提議，但看見我和獨清都是這樣麻糊潦草而不耐煩，也就不提了。這確是我和獨清之過。

大概是營業收入減少吧。各人所需的生活費不能按數照支了。問紹宗，紹宗則說大家都支過了。他的意見是：大家應按照自己的稿費版稅支款，不可規定某人按月應支多少生活費。譬如李聲華，（即李鐵聲，是李書城的公子，當然不是普羅階級。但他是只向創造社出版部要錢，老不供給稿

件。有一次伯奇對我說，他曾勸李聲華編書，李聲華回答說，我不是爲編書回上海來的。他的意思大概是爲革命回來上海的。但到後來，他欠了創造社出版部不少的錢，看見無錢可領後，又回東京領庚款去了。）只按月領款，不供給稿件。那末誰吃誰的剩餘價值呢。我是贊成紹宗的主張，但是積習難反，並且王鄭也不能贊成這個辦法的。故我不敢提出來說。紹宗嗣後就不能應他們的要求即付款了。於是全體都對紹宗不滿意了。

有一天早上，獨清跑到我家中來說：“初梨要錢搬家，決不能答應他，不可爲他催紹宗付款，我也囑過了紹宗。”我問獨清爲什麼不許初梨搬家。獨清說“初梨要搬去和××同住。怕他和××同住後，長了他的氣焰。”我聽見後一時無話可答。我真可憐獨清事事都這樣用心深刻，徒自苦耳。獨清走後，初梨來了，他問我：“你們三人中到底誰負經濟上的責任？”（當選出三個常務理事時，以我負經濟的部分，獨清負編輯的部分，伯奇負庶務的部分。）

我問有什麼事體。他說“向紹宗要不着錢，只要三十元搬家。”我當下真慚愧難過，僅僅三十元，不單創造社應該給他，他的搬家理由也是使我十分表同情的。我便答應負責叫紹宗付款。初梨去後，我即赴麥拿里找紹宗。但紹宗不在。我還留了一張條子囑勸紹宗的，擱在他的檯面上。但後來聽見初梨忽然不搬家了。我想獨清一定因此次的事件，對我又抱了一般的反感。

三

在仿吾決定于五月初間的一天赴日本了。一天獨清忽然走來我家裏說：

“仿吾要走了。我們要叫他交下一點錢來給我們，作創造社的準備金。……”

我想，仿吾已經把出版部交下來給我們負責了，據紹宗的報告，又約有二千元的款存在銀行裏，還有什麼錢要仿吾交下來給我們呢。我便把我的意思說了出來。

“不。仿吾還有五萬多塊錢。”

“他何能有這些錢呢。”

我有點驚異，但無論如何不相信。獨清便告訴我，仿吾為黃埔軍校採辦軍事化學用品的款沒有用出，還存在銀行裏。他又說仿吾曾把銀行札寄存在他家裏過來，他看見有50000的字數。他這樣的硬證，我當然不敢為仿吾辯護了。不過我當時想，天下有多少軍閥貪官污吏，從廣大的勞苦貧民身上剝削得多量的脂膏存貯在帝國主義銀行裏，而無人敢指摘半句。仿吾在替黃埔軍校採購軍事化學用品，到日本去，而廣東政府在他動身不久之後，即解除了他的職務，他不但無半點怨言，並且一批二批的把化學用品寄回廣州去，但廣東政府仍加他以種種的罪名；所以在上海的社友如沫若等都寫信去叫仿吾不必再賣氣力了。（據仿吾親口對我說的）但是仿吾在日本已經付了款，並且在上海時，也已經向某德商購了一批化學用品。所餘五千元左右，仿吾即以之為失業後之生活費，我想這

是受之無愧吧。但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仿吾因為經手了這件事，不單社外的人疑心暗鬼加以種種的臆測，誣仿吾的侵吞公款。即社內的人亦虎視眈眈羣思染指。嗚呼！此即所以為支那人乎！譬如我年中無間歇地寫二三部小說，獲得稿費二三千元，僅敷家人一年生活，小孩子教育費尙無從出，而一般嫉妒者流便說我得了多量的稿費，有十餘萬之貯蓄。像這些人全無推理作用的頭腦，怎樣有資格談革命呢？誠如紹宗所說，他們太把出版部的收入看重了，而妨害了他們在人生上應做的工作。獨清的確是想一手把持創造社及出版部，才借用革命的問題。（至少在1927年夏，我的直觀是這樣的）決不是因對革命（？）有誠意才欲統一創造社或佔領出版部的。

紹宗去職後，在嘉興寫了一封信，雖然刻薄一點，但亦可以證明他們當日在創造社之作雞鶩爭食，紹宗的信內容是：

“創造社出版部整理會諸先生：對不起，說是

靶子路的話，却一跳，跳到此地來了。我現在謹以十二分的誠意謝謝你們，雖然身邊只有險些給××××拿了去的二百餘洋，却也可以樂得安閒活一二日。錢完了可以做工了。會餓死，不必同蒼蠅逐臭一般的死釘住出版部這一塊肥肉。憑你們說是我舞弊罷。我用却用掉了出版部千餘元。如果你們查出來了，敢請你們同××××的八個月千二百元乾薪，和如××××先生一般的掛名不理事的五十元大洋一月的理事薪比比，也算在我的薪水上面吧。雖說他們是明支，我的是暗算，有偽君子和真小人之分，然而問起良心來，我倒不必有愧呢。後會有期，祝諸君長健。成紹宗，七月廿三日。”

這封信封面寫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一〇一號創造社出版部理事會升，嘉興成寄，後面封口貼四分郵票，有嘉興郵局的郵戳。

我在這裏要申明的有幾項。

- (1) 我從來就沒有希望出版部接濟我一家的生活費。即在失業來上海後，亦自尋生計。故出版部欠我的版稅如此之多。
- (2) 我掛名過短期理事，但從未支過理事薪水，所以紹宗信內無我的名字。
- (3) 我沒有死釘住出版部那塊肥肉，把它吃乾了後，仍不肯走。我也決不做這樣無聊的人。
- (4) 我^以不借“革命招牌”以吃他人的剩餘價值。

言歸正傳。我聽了獨清的話後，半說笑般地對他提議。

“假如仿吾真有這末多錢，我們敲敲他的竹槓吧。”

“好的，好的！要怎樣敲呢？”

獨清只是會寫點文章，對於什麼事體不會做，也不會籌劃什麼方法，連如何地向仿吾啓口敲竹槓都要取決於我的。

“對他說，出版部每月給我們的錢不夠我們生活，要他給些錢給我們作準備金，以防不時之需。”

“好的，好的！”

獨清緊攢起他的厚脣，雙腳似乎要跳起來般地那樣歡喜。那種小孩子的神氣真有點可愛。

到了晚上，仿吾來了，我問他是否有五萬元存在銀行裏。仿吾聽見後，長歎一聲，過了好一會，他才說，

“外面人造我的謠，不要緊。連社內的人都這樣疑我，所以我灰心了。……管他媽的，放一炮，（出幾本必禁的書之意）出版部給他們封了算了。”

他發了一陣牢騷後，才告訴我，他由黃埔動身時，領到50000元毫洋是真的。但是裏面須撥出7000元給一個姓李的收管，作仿吾不在時的兵器化學研究所的一切開支。這個姓李的也是留日帝大的同學，應用化學科出身，仿吾走後，由他代理主任。他親筆（他是我的小同學，並且在民國元年前和我一同考得留日官費，赴日本的，所以我認識他的。

筆跡。)所寫的7000元毫洋收據，仿吾給我看了。到香港後，把4000元毫洋改匯日金，便不滿日金 0000了。除在上海日本兩次購買化學用品，去了三萬左右，仿吾說，他借給友人並在日本時的用費也共去了數千，所存的只有五千日金而已。在那時的日金匯價只當國幣的95%左右，再換回國幣，實不滿四千元了。他還把日本津島會社的收據及上海德國某公司的收據給我看了。事實已然這樣明白，仿吾當然沒有50000的私蓄了。我想或許是獨清把5000誤認成50000了吧。仿吾又說，他要兩千到歐洲去走走。其餘三千作出版部的準備金。他並且說，他已把這個意思告訴了獨清。

次日，我見了獨清，又把仿吾的話告訴了他。但他無論如何不相信。他說，仿吾存款一定有兩本存摺，他的的確確看見是一個5字，下面有四個圈兒。

“不管他有多少錢，他已經有意為出版部留二三元。我想，出版部的現狀並無須加資，我們兩

人各要求他給一千元來暢用暢用吧。

這是我的提議，獨清覺得一人一千元，仿吾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仿吾是個吝嗇鬼，向他要不這許多。”

“那末各人向他要\$500吧。”

“儘管向他說說。要得到二三百元都可以了嘛。”獨清露出他的當門那兩個大牙板來在嘻嘻地笑。於是我和獨清間成立了一個密約，決意不給伯奇知道，一個人向仿吾敲五百元的竹槓。

獨清走後，我的妻來問我，你們商量什麼事情，那樣笑得有味。我也當做一件趣事般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妻。但是妻表示反對。

“你不必去妄貪他人所有的，也莫把你所有的胡亂給人家用。要用自己的力量換來的飯才吃得甘美，也受之無愧。你還是向出版部算一算版稅。要一部分回來用。仿吾先生走後，知道他們給錢我們不給。到那時候，怕飯都沒有得吃了。自己有版稅不敢向他們要，還說敲他人竹槓！”

預想不到妻這樣地板起臉孔來罵我。我想，把這件有趣的事說給她聽，叫她開心開心的，反給她揩了一鼻子灰。但是過後一想，一般雖然說“婦人之言切不可聽，”不過妻這回的見解實在堂皇而冠冕。捨正當的版稅於不顧，而貪圖非分之錢，的確不對。我便寫了一封長信去要求仿吾，在動身之前，和紹宗商量在出版部存款分下撥五百元給我，作清我的一部分版稅。難得仿吾紹宗都同意了。我只把圖章交給仿吾，第二天仿吾便送了一本界路上海銀行存款摺來給我，並將圖章交回來。我的\$500就算到了手。但不是敲仿吾的竹槓而是我應得的版稅。我這樣地要了\$500來，而每月又還向出版部要百元的生活費，把這\$500攔在銀行裏生息，這不單激怒了獨清，並且激怒了出版部的小夥計吧。他們到現在還借用革命的口實(?)來向我放冷箭，在小報上投稿誣陷我，都是起因於那時候對我的惡感吧；然而我並沒有得罪他們啊。

因為我姑妄求之，而仿吾竟姑妄與之的五百

元拿過手後，和獨清所約的向仿吾敲竹槓當然不能實踐了。獨清天天來催我要趕快下共同的總攻擊，而我好像是給總經理買收了的，不肯向仿吾動手，又不敢向獨清說我已經支了\$500的版稅。我在那時候真感着一種矛盾，精神上頗為痛苦。關於這點，我算對不住獨清了。然而，在道理上說，我是沒有什麼錯處啊。

獨清還是儘催促我，要我像某軍閥要餉般地 toward 仿吾先發難，他便好跟着來。

“你先向他說吧。你說了後，我可以從傍幫忙。”但是獨清無論怎樣決不願意先向仿吾開口要錢。我也儘拖延不願意先說，以後有好幾天，獨清不來我家裏了。我又疑心獨清莫非獨向仿吾進行了麼。我想，如果是真的，那也好，讓仿吾也給他\$100吧。

仿吾動身的日期一天一天地迫近了來，獨清很慇懃地陪着他東奔西走，到公司裏去買旅行箱，買草帽，法國人的銀行裏去替他匯款往法國。因

爲仿吾打算赴法國，而獨清是熟悉法國情形，並且會說法國話的。

“這位出版部的總座真有本領。獨清也給他撫摸得乖乖地聽命，替他走奔買辦物事了。”

我當下這樣感歎着對自己說。我疑心仿吾至少出了兩百元把他買收了吧。

仿吾動身的前兩晚，在北京路功德林請我們吃素菜，表示辭行。次晚，我們在愛多亞路都益處，爲他餞行。大家把仿吾灌醉了。獨清忽然走到我面前來，拉了拉我的衣袖，要我到廳外去。

“什麼事？”

我低聲地問他。

“他們真糟！儘是這樣鬧！我們還有重要的話沒有向他說呢。”

“\$500的話麼？”

“是呀，此刻不向他要，沒有時候了。”

這叫我真的無辦法了。假如仿吾肯給錢我們，但也是晚間十點多鐘了，怎麼能向銀行支款呢，而

仿吾又是明早一早就走了。但我只好聽命，作早散會，叫了汽車一同趕回永安里來，近十二點鐘了。我們三人之外，還有仿吾的哥哥，四個人，坐在永安里128號的三樓上，像討論軍國大事那樣地作鳩首會議。但是仿吾酒意還沒有清醒，瘋瘋癲癲地東扯西拉。獨清則是異常心焦的樣子，儘提出些出版部今後應當怎樣振作，怎樣擴充的話來說。他的用意是想由此促動仿吾聯想到準備金之尚未交下。

“你們要努力呀！”

仿吾擺了擺他的猴兒臉說了後，又在狂笑。獨清向我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要我向仿吾要錢。但我儘坐着不動，不言也不笑，因為我實在疲倦了。

“要回去歇息了。”

我立起身來要走。

“不忙！不忙！”

獨清忙止住我。

仿吾還是瘋瘋癲癲地把一知半解的法國話說

出來和獨清談。過了一忽，仿吾忽然向獨清說：

“你把夏亢龍君的住址寫下來給我吧。到法國後要找他。……”

仿吾拿出一張名片來，叫獨清寫了二三行我不認識的法文，他又把它塞進衣袋裏去了。獨清再向我作手勢，我無論怎樣不願先啓口，我只答覆了一個手勢給獨清，他在他臉上登時表示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氣。

因為他的哥哥還有話要向他說，仿吾回他哥哥的室內去了。我們看看時鐘又快到十二點了。

“要鎖弄堂了。我要走了。”

我立起身來說。獨清無可奈何地跟着我下來。才下了扶梯，忽然聽見仿吾在樓上叫：

“獨清！獨清！”

獨清聽見推了一推我，臉上登時表現出一種喜色，忙跑上樓，到仿吾的哥哥房裏去。

“真地仿吾有幾百元給我們也說不定。”

這樣想着，也跟了上來。利益應當均沾啊。

“我叫你把夏君的住址寫下來，寫了沒有？”

仿吾坐在他哥哥的床沿上，醉眼矇矓地向着站在一邊的獨清問。我立在房門首，要笑出聲來了，忙極力忍住。

“剛才不是寫了？你擱在衣袋裏了？”

獨清的不高興的聲氣。仿吾探手進衣袋裏去，摸了一摸，果然有那張名片。

“好了！好了！有了，有了！你們滾蛋吧！”

仿吾猴子臉上又堆着笑，一面說一面向我們揮手。

“豈有此理！”

塔地一響，獨清在仿吾的左頰上打了一掌。

“噫！……噫！……噫！”

仿吾噙着嘴唇在苦笑。

“呵，呵，哈，哈，哈！”

我一面笑一面走下樓來了。

第二天，我，獨清，伯奇和仿吾的哥哥在匯山碼頭看着仿吾乘長崎丸走了後，我向獨清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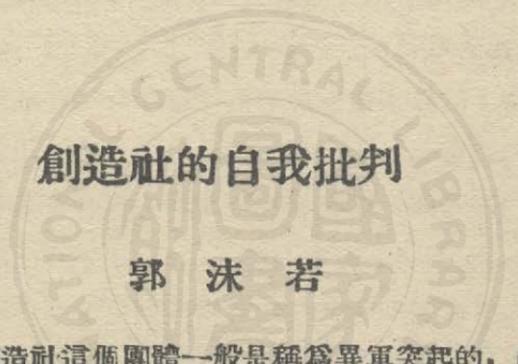
“我們一路回去吧。”

“.....”

獨清滿臉不高興地不理睬我，也不答應我。我
只好一個人走回家來。

【本文原載“黎雷”月刊。“黎雷”停刊，未
見作者續寫，故僅至此為止。原文“我”“吾”二
字並用，此處悉改爲“我”，以從一律。】





創造社的自我批判

郭沫若

創造社這個團體一般是稱爲異軍突起的，因爲這個團體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張對於“新青年”時代的文學革命運動都不曾直接參加，和那時代的一批啓蒙家如陳，胡，劉，錢，周，都沒有師生或朋友的關係。他們在當時都還在日本留學，團體的從事於文學運動的開始應該以一九二〇年的五月一號創造季刊的出版爲紀元（在其一兩年前個人的活動雖然是早已有的），他們的運動

在文學革命爆發期中又算到了第二個階段。前一期的陳，胡，劉，錢，周，主重在向舊文學的進攻；這一期的郭，郁，成，張却主要在向新文學的建設，他們以“創造”為標語，便可以知道他們的運動的精神。還有的是他們對於本陣營的清算的態度。已經攻倒了的舊文學無須乎他們再來抨擊。他們所攻擊的對像却是所謂新的陣營內的投機份子和投機的粗製濫造，投機的粗翻濫譯。這在新文學的建設上，新文學的價值的確立上。新文學的地位的提高上是必經的過程。一般投機的文學家或者操觚家正在旁若無人興高彩烈的時候，突然由本陣營內起了一支異軍，要嚴整本陣營的部曲，於是羣議嘩然，而創造社的幾位份子便成了異端。他們第一步和胡適之對立，和文學研究會對立，和周作人等語絲派對立，在旁系上復和梁任公，張東蓀，章行嚴也發生糾葛，他們弄到在社會上成了一支孤軍。

其實他們所演的腳色在創造季刊時代或創造

週報時代，百分之八十以上仍然是在替資產階級做喉舌。他們是在新興資本主義的國家，日本，所陶養出來的人，他們的意識仍不外是資產階級的意識。他們主張個性，要有內在的要求，他們蔑視傳統，要有自由的組織。這內在的要求，自由的組織（大意見創造季刊二期的編輯餘談）無形之間便是他們的兩個標語。這用一句話歸總，便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個人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根本精神。他們在這種意識之下，努力行動了，努力創造了，然而結果是同樣受着中國的資產階級的文化不能遂其自然成長的詛咒，他們所“創造”出來的結果，依然不外是一些不具體的侏儒，劃時代的作品在他們的一羣人中，也終竟沒有產出！

然而天大的巨浪衝蕩了來，在五卅工潮的前後，他們之中的一個，郭沫若，把方向轉變了。同樣的社會條件作用於他們，於是創造社的行動自行劃了一個時期，便是洪水時期——洪水半月刊的

出現。在這時候有潘漢年，周全平，葉靈鳳等一批新力軍出頭，素來被他們疏忽了的社會問題的分野，突然浮現上視界裏來了。當時的人稱爲是創造社的“劇變”，其實創造社大部分的份子，並未轉換過來，卽是郭沫若的轉換，也是自然發生性的，並沒有十分清晰的目的意識。（這個目的意識是規定一個人能否成爲無產階級真正的戰士之決定的標準，凡擺脫不了這個自然生長的意識的，他不自覺的會退出革命戰線。）

然而在這時期中他們內部便自然之間生出了對立，便是郭沫若和郁達夫的對立，明白的說便是無產派和有產派的對立。郁達夫在郭沫若參加了實際革命的期中，他把創造社改組了，把周，葉，潘諸人逐出社外，實際上就是這個對立的表示。一方面郭在參加革命，另一方面郁偏在孫傳芳的統治期中罵“廣東事情”。一方面郭在做“文學與革命”，另一方面郁便在罵提倡無產文學的人是投機份子。郁對內部取出清算的態度，對外部却發揮

出他的妥協的手腕。他一方面做着創造社的編輯委員，另一方面又在參預以胡適之爲主席的新月會議；以後更在小說月報中做“二詩人”的小說來嘲罵創造社的同人，那時候一批讀着郁達夫所編的“洪水”的人，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這是創造社的現代評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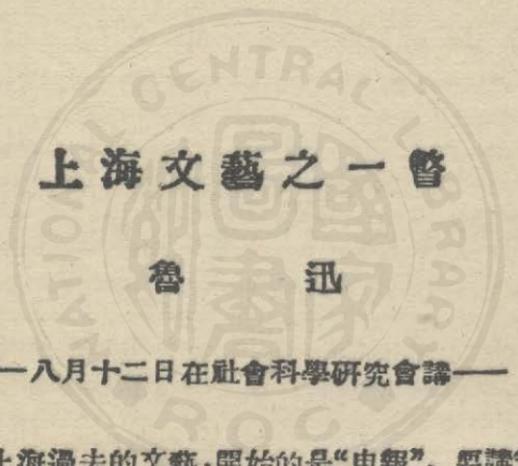
郁達夫一人的反動，敵不過的依然是整個的中國社會的潮流，他的行動在不久之間受了不甘反動的創造社同人的反對，他自己便不能不退出了創造社的隊伍，並且率性專以嘲罵創造社爲能事了。

不久之間到了一九二八年，中國的社會呈出了一個“劇變”，創造社也就又來了一個“劇變”。新銳的鬥士朱，李，彭，馮由日本回來，以清醒的唯物辯證論的意識，劃出了一個“文化批判”的時期。創造社的新舊同人，覺悟的到這時候才真正的轉換了過來，不覺悟的在無聲無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戰線。創造社是已經蛻變了，在到一九二九年的二月

七日他便遭了封閉。

這是創造社一派的十年的回顧，它以有產文藝的運動而產生，以無產文藝的運動而封閉。它的封閉剛好是說無產文藝的發展，有產文藝的告終。





上海文藝之一瞥

魯迅

——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講——

上海過去的文藝，開始的是“申報”。要講“申報”，是必須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記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時的“申報”，還是用中國竹紙的，單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則多是從別處跑來的“才子”。

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為兩種，就是君

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却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着的古今體詩之類。這是說，才子是公開的看“紅樓夢”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裏也看“紅樓夢”，則我無從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時叫作“洋場”，也叫“夷場”，後來有怕犯諱的，便往往寫作，“彝場”——有些才子們便跑到上海來，因為才子是曠達的，那里都去；君子則對於外國人的東西總有點厭惡，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決不輕易的亂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才子們看來，就是有點才子氣的，所以君子們的行徑，在才子就謂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候，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像“紅樓夢”，于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麼婊子當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內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

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後，終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他們又幫申報館印行些明清的小品書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燈謎，有入選的，就用這些書做贈品，所以那流通很廣遠。也有大部書，如“儒林外史”，“三寶太監西洋記”，“快心編”等。現在我們在舊書攤上，有時還看見第一頁印有“上海申報館仿聚珍板印”字樣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書盛行的好幾年，後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變了。他們發見了佳人並非因為“愛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祇為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于是想了種種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佔了她們的便宜。敘述這各種手段的小說就出現了，社會上也很風行，因為可以做嫖學教科書去讀。這些書裏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十（加）馱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勝利的英雄豪傑，是才子十流氓。

在這之前，早已出現了一種畫報，名目就叫

‘點石齋畫報’，是吳友如主筆的。神仙人物，內外新聞，無所不畫，但對於外國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畫戰艦罷，是一隻商船，而艙面上擺着野戰砲；畫決鬪則兩個穿禮服的軍人在客廳裏拔長刀相擊，至於將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畫“老鴿虐妓”，“流氓拆梢”之類，却實在畫得很好的。我也這是因為他看得太多了的緣故；就是在現在，我們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畫一般的臉孔。這畫報的勢力，當時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時勢”——這名稱在那時就如現在之所謂“新學”——的人們的耳目。前幾年又翻印了，叫作“吳友如墨寶”，而影響到後來也實在厲害，小說上的繡像不必說了，就是在教科書的插畫上，也常常看見所畫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視眼，滿臉橫肉，一副流氓氣。在現在，新的流氓畫家又出了葉靈鳳先生，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的畢亞茲萊（Aubrey Beardsley）剽來的，畢亞茲萊是“為藝術的藝術”派，他的畫極受日本的“浮世繪”（Ukiyoe）的影響。浮世繪雖

是民間藝術，但所畫的多是妓女和戲子，胖胖的身體，斜視的眼睛——Erotic（色情的）眼睛。不過畢亞茲萊畫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為他是頹廢派（Decadence）的緣故。頹廢派的人們多是瘦削的，頹喪的，對於壯健的女人他有點慚愧，所以不喜歡。我們的葉先生的新斜眼畫，正和吳友如的老斜眼畫合流，那自然應該流行好幾年。但他也並不只畫流氓的，有一個時期也畫過普羅列塔利亞，不過所畫的工人也還是斜視眼，伸着特別大的拳頭。但我以為畫普羅列塔利亞應該是寫實的，照工人原來的面貌，並不須畫得拳頭比腦袋還要大。

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很受着這“才子十流氓”式的影響，裏面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看了之後，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

才子十流氓的小說，但也漸漸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則因為總是這一套老調子——妓女要錢，嫖客用手段，原不會寫不完的；二則因為所用的是蘇白，如什麼倪=我，耐=你，阿是=是否之類，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們之外，誰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十佳人的書，却又出了一本當時震動一時的小說，那就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迦茵小傳”(H. R. Haggard: 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據譯者說，原本從舊書攤上得來，非常之好，可惜覓不到下冊，無可奈何了。果然，這很打動了才子佳人們的芳心，流行得很廣很廣。後來還至于打動了林琴南先生，將全部譯出，仍舊名為“迦茵小傳。”而同時受了先譯者的大罵，說他不該全譯，使迦茵的價值降低，給讀者以不快的。於是纔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實非原本殘缺，乃是因為記着迦茵生了一個私生子，譯者故意不譯的。其實這樣的一部並不很長的書，外國也不至于分印成兩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對於婚姻

的見解了。

這時新的才子十佳人小說便又流行起來，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陰花下，像一對胡蝶，一雙鴛鴦一樣，但有時因為嚴親，或者因為薄命，也竟至于遇見悲劇的結局，不再都成神仙了，——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到了近來是在製造兼可擦臉的牙粉了的天虛我生先生所編的月刊雜誌“眉語”出現的時候，是這鴛鴦胡蝶式文學的極盛時期，後來“眉語”雖遭禁止，勢力却並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來，這纔受了打擊。這時有伊孛生的劇本的介紹和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的別一形式的出現，雖然並不是故意的，然而鴛鴦胡蝶派作為命根的那婚姻問題，却也因此而諾拉（Nora）似的跑掉了。

這後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的出現。創造社是尊貴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尊重自我的，崇創作，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

文學研究會相對立。那出馬的第一個廣告上，說有人“壟斷”着文壇，就是指着文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却也正相反，是主張爲人生的藝術的，是一面創作，一面也看重翻譯的，是注意於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這些都是小國度，沒有人懂得他們的文字，因此也幾乎全都是重譯的。並且因爲曾經聲援過“新青年”，新羅夾舊羅，所以文學研究會這時就受了三方面的攻擊。一方面就是創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藝術，那麼看那爲人生的藝術的文學研究會自然就是多管閑事，不免有些“俗”氣，而且還以爲無能，所以倘被發見一處誤譯，有時竟至於特做一篇長長的專論。一方面是留學過美國的紳士派，他們以爲文藝是專給老爺太太們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爺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學士，藝術家，教授，小姐等等，要會說Yes, No，這才是紳士的莊嚴，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爲什麼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第三方面，則就是以前說過的鴛鴦胡蝶派，我不知道他們用的

什麼方法，到底使書店老板將編輯“小說月報”的一個文學研究會會員撤換，還出了“小說世界”，來流布他們的文章。這一種刊物，是到了去年才停刊的。

創造社的這一戰，從表面看來，是勝利的。許多作品，既和當時的自命才子們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幫助，勢力雄厚起來了。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員的譯著的出版，——這是說，郭沫若和張資平兩位先生的稿件。這以來，據我所記得，是創造社也不再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誤譯之處，來作專論了。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十流氓式的。然而，“新上海”是究竟敵不過“老上海”的，創造社員在凱歌聲中，終於覺到了自己就在做自己們的出版者的商品種種努力，在老板看來，就等於眼鏡鋪大玻璃窗裏紙人的映現，不過是“以廣招徠”待到希圖獨立出版的時候，老板就給喫了一場官司，雖然也終於獨立，說是一切書籍，大加改訂，另行印刷，從新開

張了，然而舊老板却還是永遠用了舊版子，只是印，賣，而且年年是什麼紀念的大廉價。

商品固然是做不下去的，獨立也活不下去。創造社的人們的去路，自然是在較有希望的“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在廣東於是也有“革命文學”這名詞的出現，然而並無什麼作品，在上海，則並且還沒有這名詞。

到了前年，“革命文學”這名目這纔旺盛起來了，主張的是從“革命策源地”回來的幾個創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自然是因為由於社會的背景，一般羣衆，青年有了這樣的要求。當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跑到實際工作去了，那時還沒有什麼顯著的革命文學運動，到了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羣衆，而死剩的青年們再入於被迫壓的境遇，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才有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

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雖然其中也有些是舊文人解下指揮刀來重理筆墨的舊業，有些是幾個青年被從實際工作排出，只好藉此謀生，但因為實在具有社會的基礎，所以在新份子裏，是很有極堅實正確的人存在的。但那時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是未經好好的計畫，很有些錯誤之處的。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的地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着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十流氓的毒。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

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鬧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由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例如上海流氓，看見一男一女的鄉下人在走路，他就說，“喂，你們這樣子，有傷風化，你們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國法。倘看見一個鄉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說，“喂，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該捉到捕房去！”這時所用的又是外國法。但結果是無所謂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幾個錢就都完事。

在中國，去年的革命文學者和前年很有點不同了。這固然由於境遇的改變，但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裏，還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斷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面。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

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所以前年的主張十分激烈，以為凡非革命文學，統得掃蕩的人，去年記却得了列寧愛看岡卻羅夫(J. A. Gontcharov) 的作品的故事，覺得非革命文學，意義倒也十分深長；還有最徹底的革命文學家葉靈鳳先生，他描寫革命家，徹底到每次上茅廁時候都用我的“吶喊”去揩屁股，現在却竟會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屁股後面了。

類似的例，還可以舉出向培良先生來。在革命漸漸高揚的時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還曾經說，青年人不但嗥叫，還要露出狼牙來。這自然也不壞，但也應該小心，因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馴服的時候，是就要變而為狗的。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好壞鬥爭”的武器。狗也是將人分為兩種的，家養牠的主人之類是好人，別的窮人和乞丐在牠的

眼裏就是壞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這也還不算壞，因為究竟還有一點野性，如果再一變而為吧兒狗，好像不管閑事，而其實在給主子盡職，那就正如現在的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只好去點綴大學教室了。

這樣的翻着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A要變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於是就變成了B。譬如水的結冰，溫度須到零點，同時又須有空氣的振動，倘沒有這，則即便到了零點，也還是不結冰，這時空氣一振動，這纔突變而為冰了。所以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並非突然的事。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却並沒有變，

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因為這時已經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但也正因為更加堅實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因為有了這樣的壓迫和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將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喫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麵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有的寫悔過書，有的是反轉來攻擊左聯，以顯出他今年的見識又進了一步。這雖然並非左聯直接的自動，然而也是一種掃蕩，這些作者，是無論變與不變，總寫不出好的作品來的。

但現在的左翼作家，能寫出好的無產階級文學來麼？我想，也很難。這是因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緣故。日本的厨川白村(H.

Kuriyakawa)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說：作家之所描寫，必得是自己經驗過的麼？他自答道，不必，因為他能夠體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姦，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裏，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級階化”的口號，就是對於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致命與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並非要將本階級或資產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

望於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產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鬩於牆”，兩方一樣是敵對。但是，那結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爲一粒泡沫的。對於這些的作品，我以爲實在無須稱之爲無產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爲了將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爲無產階級作家的。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於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牠的底細，尤其是認爲敵人的底細。隨手舉一個例罷，先前的“列寧青年”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將這分爲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爲無產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爲小資產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爲資產階級文學派，却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這就在表明：這位青年批評家對於愈認爲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

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我想，這是在現在環境下的作家，只要努力，還可以做得到的。

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着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饉狀態。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也就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

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爲“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厲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兇到絕頂一樣。

在一部舊的筆記小說——我忘了牠的書名了——上，曾經載有一個故事，說明朝有一個武官叫說書人講故事，他便對他講檀道濟——晉朝的一個將軍，講完之後，那武官吩咐打說書人一頓，人問他什麼緣故，他說道：“他既對我講檀道濟，那麼，對檀道濟是一定去講我的了。”現在的統治者也神經衰弱到像這武官一樣，什麼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佈置了比先前更進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厲害的流氓手段：用廣告，用誣陷，用恐嚇；甚至於有幾個文學者還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圖得到安穩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了，較之簡單地用

着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而因此也就影響到文藝上面來。

現在上海雖然還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謂文藝雜誌，其實却等於空虛。以營業為目的的書店所出的東西，因為怕遭殃，就竭力選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如說“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類，那特色是在令人從頭看到末尾，終於等於不看。至於官辦的，或對官場去湊趣的雜誌呢，作者又都是烏合之衆，共同的目的只在撈幾文稿費，什麼“英國維多利亞朝的文學”呀，“論劉易士得到諾貝爾獎金”呀，連自己也並不相信所發的議論，連自己也並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說，現在上海所出的文藝雜誌都等於空虛，革命者的文藝固然被壓迫了，而壓迫者所辦的文藝雜誌上也沒有什麼文藝可見。然而，壓迫者當真沒有文藝麼？有是有的，不過並非這些，而是通電，告示，新聞，民族主義的“文學”，法官的判詞等。例如前幾天，“申報”上就記着一個女人控訴她的丈夫強迫雞姦並毆打得

皮膚上成了青傷的事，而法官的判詞却道，法律上並無禁止丈夫雞姦妻子的明文，而皮膚打得發青，也並不算毀損了生理的機能，所以那控訴就不能成立。現下是那男人反在控訴他的女人的“誣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於生理學，却學過一點，皮膚被打得發青，肺，肝，或腸胃的生理的機能固然不至於毀損，然而發青之處的皮膚的生理的機能却是毀損了的。這在中國的現在，雖然常常遇見，不算什麼稀奇事，但我以為這就已經能夠很明白的知道社會上的一部分現象，勝於一篇平凡的小說或長詩了。

除以上所說之外，那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鬧得已經很久了武俠小說之類，是也還應該詳細解剖的，但現在時間已經不夠，只得待將來有機會再講了。今天就這樣為止罷。





“創造十年”發端

郭沫若

創造社自1929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鎖以來，已經滿了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牠自成立以來的經過追記出來，我也有那樣的心事，但總牽延着，一直牽延了三年。我現在終於決了心，要費點工夫來記錄出我所知道的創造社，或者更適切地是以創造社爲中心的我自己的十年間的生活。牽延了三年，使我終於起了決心的，說也奇怪，却要感謝我們中國的大小說家魯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號，一位日本朋友 K 君到我寓裏來，談到了中國的文藝，談到了魯迅先生。

他問我，“魯迅是怎樣的立場？”

我說，“魯迅是一位用寫實手法的作家，在前頗帶着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近年聽說是轉換到左翼來了。”

“是的，”那朋友說，“我們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稱魯迅為左翼之雄的。”

K 的說話顯然是含蓄有一些鋒芒，但我們也沒有作怎樣的深談，因為我對於魯迅先生的舊作既少研究，他的轉換方向以後的新作我也還沒曾看見。

在臨走的時候，那位朋友取出了一本黃油紙封面的雜誌來，遞給我，我看時有似篆非篆的“古東多卬”的四個紅字。旁邊還有一行鉛印的標識：

“佐藤春夫編輯 古東多万 第二號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這“昭和六年”是民國二十年，西歷1931年，

更簡切的說一句，便是去年。照那標識看來，自然是雜誌了。

K 把目錄揭開，指示着“上海文藝之一瞥”下署着魯迅的給我看，他說，“這篇文章很有趣，請你留着讀一讀。”

我多謝了他，問他，“古東多万是甚麼意思？”

他說，“這書的表紙背面便有解釋。”

翻開表紙背面來看，是從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來的一段解說，原來，“古東多万”的發音是 kotodama，寫成漢字是“言靈”；照那解說直譯出來是：

“我國之言語之自由地變化，具有一種靈妙的作用之謂。國語之妙用。”

再翻到書後的“編輯餘談”來看了一下，才知道這“古東多万”用的是“萬葉假名”——日本的一部古歌集用漢字寫的日本字母——竟連日本人都不懂，屢屢質問，問得編輯先生“不耐煩而且冒火”，所以在表紙背面才引用了那一段字典。

我看了着實暗地感嘆了一下，我對K說，“要懂一種外國文字，像在這些地方真很困難呢。老實說，我起初看見封面時，我以爲你是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廣告。”

“哈哈，我初看見的時候我是把它當成了法西斯諱的機關報的。”

“怎的呢？”

“有個卍字啦，德國的法西斯諱希屈拉派打的是這個商標。”

彼此笑了一會，K才告辭着走了，我便把我們魯迅先生的文章繙了出來，原來是魯迅的講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譯記的。據那譯記者“九月十七號在上海”寫的短序上說：

“上海文藝之一瞥”，是最近在當地某處，魯迅祕密的講演，那講演的大要在當地的週刊‘文藝新聞’上連載了。然而‘文藝新聞’在其立場上，顧慮到官邊，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刪削。但是魯迅又根據那連載於新聞的筆記，

更把敘述弄得懇切周到，更適切地把辛辣的罵倒直言出來，改寫了這篇‘上海文藝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寫了的原稿向僕講說了的譯錄。”

我看到有“祕密”，有“顧慮到官邊”的字樣，已經就虔敬了起來，我預想到我們的戰士一定是展開了一篇左翼的理論，對於上海的御用文學民族主義派一定加了“辛辣的罵倒”。我如飢似渴地把那二十幾頁的長文，一口氣讀下去，看他的確是罵了好些人，罵了鴛鴦蝴蝶派，罵了創造社，甚且對於左翼運動也沒有忘記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讀到尾上才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以上所說之外還有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許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俠小說之類，應該詳細解剖。可奈已經沒有時間，等到將來有機會時再講。”

就好像讀舊式的章回小說，讀到起勁處，却被“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講”的一段手法欺騙

了的一樣，我的一口氣軟了下來。我鼓着勁要跳過一條三尺寬的溝，鼓得一臉通紅，仍然跳不過去，立在溝的邊上。像這樣的講演我不知道有什麼“祕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什麼地方要“顧慮到官邊”。在“文藝新聞”上所發表過的內容，我不曾看見。我們魯迅先生所“改寫”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還沒有發表出來。我現在暫以一個准魯迅崇拜者的資格，把日譯文中罵到創造社的地方要忠實地——我特別在這“忠實地”下加着注意點——重譯成中文。前後的文脈自然要稍稍顧慮着，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譯出來：因為我們魯迅先生的改寫稿一定有發表的機會，即使沒有，將來也一定有魯迅先生的忠實的——又來加上注意點——崇拜者來重譯全文，我是不好把這一筆稿費替人奪掉的。

講演的開頭是說到上海過去的文藝，舊式的才子佳人派；其次是說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派。這鴛鴦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漸受打擊”。“那時有易卜生的脚本之介紹，有胡適之先生

的‘終身大事’那樣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問題劇出現。”以下便論到創造社來了。

“此後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出現，創造社尊重天才，是藝術至上派，專重自我，崇創作，恨翻譯，尤憎恨重譯，與同時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其出陣最初之廣告上，言有壟斷文壇者，即指文學研究會也。”

在創造社的頭上加上了一頂瓜皮小帽，輕輕地便把創造社的一羣窮小子化成了鴛鴦蝴蝶。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媿是紹興人，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刀的風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於“藝術至上派”，魯迅先生似乎很是學貫中西，大約王爾德，波陀勒爾一類的人物，又是歐洲的鴛鴦蝴蝶派罷？是的，“創造社尊重天才，專重自我，崇創作”，這倒不是什麼罪過。無論在怎樣的社會裏，天才是不能否認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釋罷了。馬克思昂格爾斯列甯不是絕大的天才嗎？就是我們魯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特別在“辛辣的單

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在“重自我，學創作”的一點上，創造社的那些窮小子似乎都還沒有我們的大天才魯迅先生的那麼“專”，不信你請去嘗試一下罷，只要你有膽量敢把“先生”兩個字誤排成“老生”，或者對於“吶喊”沒有搖旗吶喊一下，你看他先生會是怎樣地慷慨，他至少是會恭維你是“才子”的。“恨翻譯”？尤憎恨重譯”？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裏面的一個人，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並也“重譯”過不少的東西啦！是的，那些東西怕沒有值得我們魯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過不負責任的翻譯和重譯，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例，創造社也幹過些指摘的事情，魯迅先生大約就是根據的這些罷？這好像是在說“你恨酸敗了的麵包的人，便是恨麵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羅輯”。至於廣告的一件，那是要請達夫先生負責的，說詳本文。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反對，主張爲人生之藝術，一面創作，一面重視重翻譯，並注

意介紹了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因為彼等小國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文字，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譯。而且文學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遂為新敵與舊敵所夾，受了三方面的攻擊。一方面是創造社，他們既尊重天才的藝術，以主張人生流之藝術的文學研究會為沒頭於閑事，為‘俗’（此字原譯文有引用符，不知魯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創造社員的話），且為無能，所以一發見了一個誤譯，有時便要大賣氣力地寫一篇很長很長的專論。”

第二方面說的是吳宓所代表的論衡一派，第三方面是所謂鴛鴦蝴蝶派，在這兒魯迅先生又不費力地（？）把創造社來和論衡派鴛鴦蝴蝶派歸為了一類，而使文學研究會承繼着新青年和“終身大事”的正統。似乎創造社之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新敵”，是因為該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是的，魯迅先生到底不媿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員，在這些地方却很能替本店發賣膏藥，“貨真價實，只

此一家”——只有文學研究會是文學的正統，是最革命的團體。我們在這兒來高呼幾聲口號：

革命的文學研究會萬歲！

擁護文學的正統！

打倒一切反動的文學團體！

擁護我們的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

反對文學研究會的就是反革命！

反對魯迅先生的就是反革命！

是的，還有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也是該得高呼幾聲萬歲的。我們貴大民國的貴大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壓迫民族”了。我們貴被壓迫民族的貴民族主義的文學呢？？？在這兒我很抱歉，可惜我們魯迅先生沾染了點子章回體的小說派頭，要等到“下回分講”；於是乎讓我們的“萬歲”也就不好明目張胆地叫出來，我們須得學學我們的先生“顧慮到官邊”啦。打個折扣，叫他媽個半聲罷。好的，我們再來呼叫起來：

“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學！”

在這兒要加一個註解，這個屁股上的卅字，就和“古東多卅”的屁股上的那個字一樣，是當作“萬”字在使用。“萬歲”的一半自然就是卅，但有聰明的讀者定要把它連想到法西斯諦，那也是他的自由。

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這個罪狀不自今日起，據魯迅先生的“一瞥”看來，從與文學研究會反對以來便已經是反動了的——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真真是罪該萬死!!!公公然敢反對“聲援新青年”“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文學研究會，要指摘他們的誤譯，真真是罪該萬萬死!!!哼，你們不知道像“雅典主義”和“手式戲”一類的翻譯，不正是中華民國的國寶嗎？你們不知道那些名譯，縱不“百世”，也會“萬年”的嗎？我“魯迅先生”正告你們：文學研究會者人生之人生也，藝術之藝術也，如此之如此也，這般之這般也；“俗”云何有？豈是“無能”？“無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錯誤”之僅僅“一個”便足使汝輩

之“專論”做出“一篇”，誰能誰不能哉？——好了我摹倣我們先生的筆調似乎有點不類，然而不類者類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羅輯”。

“創造社的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來是勝利了。多數的作品既投合於當時的自稱才子輩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幫助，勢子遂盛。勢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務印書館，也就把創造社的譯著來出版了——這是說的郭沫若張資平兩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來，據我所記得的，創造社便再沒把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之誤譯來審查，來寫專論了。在這樣的地方，不好說得，豈不就是才子十珂羅茨基式乎？”（日本文的珂羅茨基 Gorotuki 譯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費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輩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們魯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樣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靈

的推想和記憶，便把一羣人的罪狀在“一瞥”之中宣佈了出來，這是何等折獄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這兒也隱隱洩漏了一點天機，他在上面罵創造社攻擊文學研究會的誤譯，在這兒把文學研究會的五個字寫成了商務印書館。哦，原來文學研究會就是等於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的一些“君子大人”（這是魯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為是和“才子痞棍”相對），特別是屬於文學研究會的我們的魯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沒有受過“大書店”的賄賂的！（至於說到我和商務印書館發生買賣關係的詳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與創造社無涉。我要在本書中提供些事實出來，在這兒暫不贅述。）

“却說，因為新上海到底不是舊上海之敵，創造社員在凱歌聲裏終自覺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書店寫商品，雖是種種的努力，然從老板一方面看來，就和眼鏡鋪的 Show-window（門面玻璃窗）中裝飾着的紙紮人物之

活活活的眼睛一樣，不外是以廣招徠的廣告而已。”

這一段把創造社員殺得又如此有自覺：因為就到現在也還有很不少的人在替書店老板寫商品，在 Show-window 中做着廣告人物，而自己却在揚揚得意的！

“於是乎才希圖獨立出版，書店老板便把他們向裁判所告發了。”

這一句話却要算是天外的奇文！這兒所說的“書店老板”自然就是泰東書局的趙南公。幸好趙南公還沒有死，創造社的幾個人也都還活着的，創造社設出版部時，原來趙南公是提起過訴訟的嗎？老實說，我對於我們魯迅先生這位大“大人君子”的腦筋不免有點懷疑。魯迅先生或者不會是有意的捏造，因為受書店老板告發，倒不是什麼大不名譽的事；我想怕是腦中的記憶有點混線，在這兒把新青年社和創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羣益書局獨立時，書局的老板提起過訴訟，這是人衆

皆知的事體。

“後來終竟獨立了，一切的書籍大加改訂，改印刷，新開起店子來，然而舊老板方面也永遠地用着舊板，一味的印刷，販賣，年年鬧着甚麼‘紀念大廉賣’。”

這幾行倒很近於事實，甚麼“紀念大廉賣”——這是九州萬國凡百商行所慣用的騙錢調門，自然不限於上海，不限於上海的書業，不限於泰東；然而這種極普遍極陳套的現象，落到我們大小說家魯迅先生的手裏是怎樣地“着手成春”了！因為這個現象一局限到這兒來，便是說：創造社的作品狗錢不值！

“在作為商品上雖是怎樣也忍耐不過，然而獨立了也沒有如意地賺出錢來，創造社的人們之走頭自然是朝比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廣東跑去了。於是乎便有‘革命文學’這個東西出現。然而怎樣的作品也沒有。在上海呢，連那樣‘革命文學’的名字都還沒有出來。”

這段的首兩句，我是很忠實地翻譯出的，然而意思是摸不準確，不知道魯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樣。不過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創造社的幾個“流氓痞棍”想賺錢沒賺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謂“革命文學”也就是那幾個“流氓”所想出的騙錢的幌子。我們這位“左翼之雄”的魯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釋真可要算是超馬克思主義的。但可惜那幾個“流氓”所鬧出的事實和先生的推論全不相符。創造社出版部的獨立是在1926年的四月一日，流氓的一員成仿吾是在1925年的六月到的廣東，當的是廣州大學的理科教授。還有幾位流氓便是郭沫若郁達夫，和一位新入流後又拆了伙的王獨清，是以1926年三月十八日從上海出發往廣東的。這“三一八”是一個紀念日，在這兒自然是用不着我來做“宣傳大綱”的，幾個流氓剛好在這個紀念日上動身，所以這個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腦裏。我記得那天在下雨，在黃浦灘碼頭上送我們上船的有一位樓建南。走的不只我一個人，又還

有送行的人催見證，可恨這個日期不好自由創作。就這樣我們在這兒還是應該痛罵那幾位創造社的痞棍，他們爲甚麼那樣早的便跑向廣東去了，沒有停一下造些事實出來和我們魯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們的“大人君子”又來形同捏造的自由創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譯文中說的是“一昨年”大約是指1927年)，‘革命文學’這個名稱才旺盛了起來，主張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來了幾個人的創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不消說是有它社會的背景，是因爲一般的民衆和青年們中有了那樣的要求。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奔走於實際運動，在那時還沒有甚麼顯著的革命文學，然而到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地鮮明了起來，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大地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羣衆，活剩下的青年們又入了被壓

迫的境遇。在這兒，革命文學才在上海成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從表面上看來是和別國不同，不是由於革命之高揚而盛，而是由於革命之挫折。（這兒的革命兩個字有點混線）其中雖也有幾位舊文人投了指揮刀又來幹筆墨的舊業，有若干的青年由實際活動趕了出來，不得不借此以謀生路，然而實際上具有社會的基礎，新分子中極堅實而正確的人多所存在。然而這時候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的意見看來，是還沒有經過十分適切的計劃，錯了的地方怎麼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錯處就是罵了魯迅先生）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的社會並沒有加以細密的分析，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夠運用的方法，便想機械地拿來運用。（這大約是責備那時的運動過激了的意思，在這兒正表示着魯迅的認識之極不正確。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的文藝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

文藝是只有純粹的戰鬥。)第二,他們,特別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東西,以一種極左的兇惡的面貌,簡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來,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鑄殺乾淨,使人對於革命只是只是懷着恐怖。(這一節不知道是根據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怨區區淺學,指不出出處來。)其實革命決不是殺人的東西(阿彌陀佛),而是活人的東西(再來一個阿彌陀佛)。像這種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這句話原有引用符,未詳出處)而自行痛快的態度,這也不好怎麼說得,只好說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毒。”

這一段文章說得倒還風涼,不過先生的苦心我們是不好看過的。便是1927年連到1928年的革命文學運動,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堅實而正確,只是創造社的幾位舊人都是投機的家伙,而且帶着“極左的兇惡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礙。就這樣,我們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要把創造社的幾位

流氓打進阿鼻地獄裏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們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後他們還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學革命運動中沒有他們的份子。在以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中也沒有他們的份子。我們的魯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領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過，那是在這樣說的：“中國的新文學中無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魯迅一個人的！”

是的，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天上地下最偉大的一個創作家，他的小說是創作，他的批評是創作，他的講演也是創作，他在“一瞥”之間便替創造社創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歷史。（須要注意：“才子”者輕薄之謂也。）

魯迅的一瞥是很長的一瞥，他以下還把近年來的左翼文學運動“瞥”了一下，在這次的運動上最可慶幸的是我們的魯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說得像煞有介事。不過他敘述創造社的地方就停止在這兒，以下的我不便再多事徵引了。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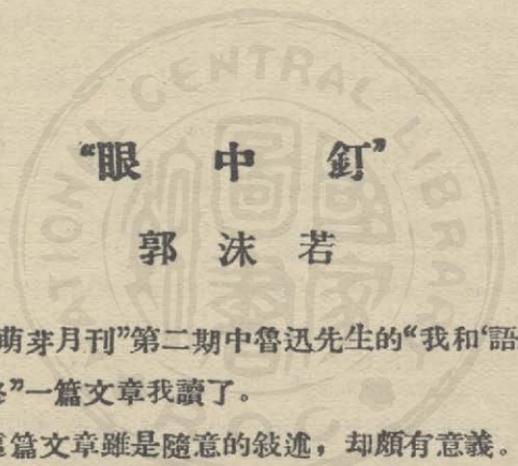
社遭了封鎖的一節，魯迅先生是絕口沒提的，當然這在“大人君子”看來是那痞棍集社的惡貫滿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團的團長一樣的前田河廣一郎從前到過一次上海，因為創造社的人沒有歡迎他；待他回國之後聽說創造社遭了封鎖，他便大大地稱快，在他的機關報“文藝戰線”上做了一篇痛罵創造社的文章，說是中國的 Ultra 派（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極左派）被中國社會清算了。我看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實在趕不上我們中國的“左翼之雄”，因為像那樣鼓睛爆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場來，何如閉着眼睛連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

總之我是應該感謝魯迅先生的，我讀了他那篇一瞥，才決心要來做這部“十年”。但我在這兒還要附帶着聲明一筆。我這“十年”並不是小說——記得國內另一位大小說家宣言過我是沒有做小說家的資格的：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

先生的那樣曲。是的，這層我自己是很承認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據說小說是“寒帶”，那嗎只適宜於Eskimo那樣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謝不敏。

還有，我這“十年”也不好就說是歷史，因為自來的歷史其實就只是小說，是由階級的立場或個人的私怨所寫出的小說。像魯迅先生的那篇一瞥，那才是真正的歷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藝史——至少可說，是史料，後代的文藝史家一定要在那兒取材的。所以我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說它是歷史。

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說本色些，就說它是一個珂羅茨基的自敘傳之一部分罷。



“眼 中 釘”

郭 沫 若

“萌芽月刊”第二期中魯迅先生的“我和‘語絲’的始終”一篇文章我讀了。

這篇文章雖是隨意的敘述，却頗有意義。因為我們在這兒可以看見一個小團體內起了自我批判，魯迅先生對於“語絲派”的以往的關係，及“語絲派”的各個成員在社會上所演的腳色，我們算得到了一個具體的認識，雖然有些地方還不免朦朧。而且魯迅先生要算是超克了“語絲派”的這個階段

得到了一個新的發展了。

我現要在來寫這篇文章不是要來批評，却是要來辯正一個事實。

魯迅先生說：

“經我擔任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

這句話可是事實，但他對於這“警告”，“禁止”，“圍攻”的社會的意義，却不曾認明。特別是他們對於“圍攻”的認識，是使我草出這篇文章的動機。

魯迅先生說：

“至於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里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魯迅先生的“下一回再說”是否已經寫出，我還不會看見。不過便單就這簡單的幾行字句看來，便可以知道魯迅先生於認識上不免錯誤，於事實

上也不免也有錯誤。“藝術之宮”的把守者的“攻擊”，和“革命”者的“攻擊”，意義是兩樣的。老實說前期的創造社的幾個人要諡以“藝術把守”的尊號，他們的資格還不配，這話說來也未免太長，暫時寄放在這兒，讓我追溯一些創造社裏幾個人對於語絲派的幾個人所發生過的文字上的關係罷。

一講創造社的幾個人，其實所謂創造社的人並沒有幾個。拿前期的來說，頂着創造社的担子在實際上精神上都發生過一些作用的，僅僅郁達夫成仿吾和我三個人而已。

就在三個人裏面，據我所知道的，達夫對於語絲派的人便從沒生過惡感。

仿吾批評過魯迅的“吶喊”，批評過周作人的小詩。

我呢，對於周作人之介紹小詩略略表示過不滿的意思（見“創造季刊”二期批評意門湖的文字裏面），對於他提倡印象批評也說過不贊成的話

頭(見“創造週報”一篇談批評的文字裏，連題名我都不記得了)。關於魯迅呢，我只間接的引用過他的一句話，便是“中國還沒有一個作家”(見“文藝論集”中“天才與教育”)，而且我還認識他的並不是“傲語”。

前期創造社的幾個人和“語絲派”的幾個人所發生過的關係就只有這一點(其實當時“語絲”還沒有出現)。

結果還只是成仿吾和我談駁過周作人或魯迅而已。所謂“歷史”就只有這樣一點歷史。

再說到我們的談駁是否有意的“攻擊”？

在這兒要夾敘一下，“攻擊”這個字在一般人是很忌避的。大抵被批評者總愛把“攻擊”這個字樣去讖定批評家，而批評家總兢兢於要辯護，說“我不是攻擊”。但在我們現在看來，凡是站在不同的階級的立場上所施行的戰鬥的批評，實質上就是“攻擊”。所以“攻擊”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上說來

是批評的要素。“攻擊”是美名，“攻擊”是無須乎忌避的。

但是我們前期的那一些談駁文字可以配得上稱為“攻擊”嗎？

在當時的所謂“語絲”也，所謂“創造”也，所謂周，魯也，所謂成，郭也，要不過一丘之貉而已！說得冠冕一些是有產者社會中的比較進步的“因迭里根洽”的集團，說得刻薄一些便是舊式文人氣質未盡克服的文學的行幫和文學的行幫老板而已，成郭對於周魯自然表示過不滿，然周魯對於成郭又何嘗是開誠佈公？（例如周作人先生便刻薄過成仿吾是蒼蠅。）始終是一些舊式的“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那兒作怪，這是我自己在這裏坦白地招認的。

自然我對於周作人先生的鼓吹小詩和提倡印象批評，就到現在我也還是反對，不過認識更明瞭了一些，不再是那種意氣的反對，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了。

仿吾的“吶喊批評”，我不能說甚麼話，因為“吶喊”我並未曾讀完，仿吾的文章也沒在我的手裏。不過我相信仿吾站在現在的立場來，恐怕他的批評又不同。那些以往的批評我們是用不着再去批評。就在當時，他的見解也不見得和我們幾個就是一致。

拿我自己來說罷。

我所讀的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是“髮的故事”，是民國九年在“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看見的。這可以說也是我第一次看見的中國的近代小說。我當時很佩服他，覺得他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大有自然主義派的風味。但同時也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彩太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這話是我一點加減乘除也沒有的表白，這假如值得說上“批評”，我對於魯迅先生的批評，截到他的“吶喊”為止，就是這樣。

“吶喊”我是沒有讀完的。在初出版時（民國十二年），我曾請泰東書局買過一本（當時我寄居在

泰東的編輯處)。有一天禮拜日我帶着孩子們到吉司非爾公園時，是帶着“吶喊”同去的。我睡在草地上從前面翻讀起，讀了三分之一的光景，我得的印象依然還是前幾年讀“髮的故事”時是一樣。但終因和自己的趣味有點反駁了的原故，所以讀了三分之一之後終竟沒有讀完。達夫雖曾對我說過，“故鄉”很不壞，“阿Q正傳”也很有一讀的價值，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後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

這便是我以前對於魯迅先生的模糊的認識，我相信和仿吾的見解，一定有多少不同。

至於說到最近兩三年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圍攻”，那情形完全是兩樣的。

中國的文藝運動在最近兩三年來完全進展到了另一種新的階段，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創造社已經不再是前期的創造社了。便宜上我們稱那最後一兩年的為後期的創造社罷。後期

創造社的幾位主要的成員，如彭康，朱鉅我，李初梨，馮乃超諸人，他們以戰鬪的唯物論為立場對於當前的文化作普遍的批判，他們幾位在最近的新運動上的成績是不能否認的。

他們的批判不僅限於魯迅先生一人，他們批判魯迅先生，也決不是對於“魯迅”這一個人的攻擊。他們的批判對象是文化的整體，所批判的魯迅先生是以前的“魯迅”所代表，乃至所認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個部門，或一部分的社會意識。

所以後期創造社的批判和前期創造社的駁斥，在意識上完全不同。新的批判自然是歷史成果，是一般社會的歷史的成果，然而在狹隘小團體的範圍之內決沒有甚麼“歷史底”或傳統的關係。

最好又拿我自己說罷。

當在一九二七年的年末，那時魯迅先生在上海，我也從廣東回到了上海。伯奇，光慈諸人打算恢復‘創造週報’，請魯迅先生合作，這個提議我是首先贊成的。記得在報上還登載過啓事，以魯迅先

生爲首名，我當時並曾對伯奇不止說過一次，有機會是很想和魯迅先生面談；但不久我病了，所以這件事情竟沒有實現。至於“創造週報”的沒有恢復是因爲大家的意思以爲不足以爲代表一個新的階段的標幟，所以廢除了前議，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這些往事我現在把它寫了出來，可以證明創造社的幾個人對於魯迅先生是並沒有甚麼成見。

然而批判之實質就是戰鬥。在後期創造社的批判一開始，在內部便生了分化，如張資平先生便是這樣分裂出去了。在外部便形成了對於魯迅先生的“圍攻”——但與其說是“圍攻”，當可說是激戰，因爲魯迅先生守着“語絲”的城壘是在努力應戰的。

以往的情形大抵就是這樣。總歸成一句話，便是創造社的幾個人並不曾“將語絲派的幾個人看成眼中釘”。

好在創造社這個小團體老早是已經失掉了它的存在了，“語絲派”這個小團體現在已由魯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揚棄了。我們現在都同達到了一個階段同立在了了一個立場 我們的眼中不再有甚麼創造社，我們的眼中不再有甚麼語絲派，我們的眼中更沒有甚麼釘子——自然站在新的立場上來的“眼中釘”是會有的，我們就不必把別人看成釘子，別人是要把釘子釘在你的眼裏——然而以往的流水賬我們把它打消了罷。



創造社訪問記

徐 祖 正

盛暑中在上海羈留期中訪問過一次寶山路的創造社。這是一到上海就想而直到很久以後才能實行去訪問的。一個人離了少年期愈遠，意志的自由也愈少了，看來這是真理。記得那個前幾日的一天也到了須搭火車去的江灣一個舊同學○君處，他一見我，說：

“近來很忙麼？”我前天遇見Y君也說到你呢。我們說這次只知道他來了上海不見他的人，恐怕

他交際廣了，來不及了。”

我聽了默想之下覺得也難怪有“拜客”那一類的惡習氣。今天去訪創造社，周全平君是我曾與他通過信的朋友，大概不會見怪我什麼了，我那麼想。一進三德里就給我找到創造社。有一個人正在那裏看書，說周君出去買事物，一回兒就來，那個人說完了就又看書。適巧周君外面回來了。上海地方比北京要便利而平民的，這我已經知道。看了周君我心裏驟然覺得一種愉快。這個愉快實在也費些說明與分析。第一是見到一向在信裏認識如今當面見到；第二在文學那個空氣裏自有一種特殊的和軟空氣使人愉快，我在那天的日記裏寫道：“見到他那個文學青年，何以心裏很覺愉快”，要不外乎上述的兩個主要理由。

我以爲就在那間陳列着書籍的房裏談談的了。周君要我到樓上去，我就走上樓去。樓上是一間辦公室。裏面三張寫字桌，一張上已坐着一個人，見我們走進去，略示招呼後仍舊俯伏在桌上寫

些什麼。周君叫我在一張辦公寫字桌前坐下，他自己站立着。看到桌上有寫着他名字的許多舊信。我與他通信時大概也就在這張桌上披讀或是作答的了——我是文學式的想像着。桌旁一個書架上滿是英德文及國內新出的本社刊行的一些書籍。沒有細看。這大約是周君平時愛讀或是研究着的書籍無疑了。

他爲我開了一瓶冰汽水。記得那天熱得厲害。我從天保里愛國女學走到北車站，與車夫講價不對，賭氣又一直徒步到三德里的，真是汗流浹背。把西服的上裝脫下來放在椅子背上看見衣背上溼了一大塊。襯衫連衣袖上都已汗透的了。蓬亂的頭髮，汗流的顏面，我實在不是對客人的心境，更不是對藝術青年的心境。但當時也決未懊悔何必去與車夫嘔氣弄得神情狼狽呢。大概這就是所謂自有特殊的和軟空氣了。在那空氣裏什麼都不顧忌。

看周君不是常常見到的那種消瘦單薄的文學青年，是碩健鎮靜同時也擅長於實際上似的青年。

言辭也極樸直。口音中似有我極相熟的一種方言音調。詢問之後，知道他是常府家鄉的人，我小時候同學之中也有好幾個常府裏的人。此刻見到了周君就把小時候腦裏的一個壞影子掃除了。心裏覺得奇怪，以為常府裏還有像周君那樣真純的人麼？因為小時候遇見常府裏的幾個同學都是刁頑奸險，留下一個很壞很深的壞影子在腦裏，到此刻還不能忘記。如今看了周君就覺得非把那個壞影子掃除不可了。大了以後也並不是沒有遇見過常府裏的人，那是都在外省或是國外，只要一問是江蘇就已感到一種親近，自然記不起前愆來了。周君的談吐真是非常合我的脾胃，我有新得着一個朋友似的那種久闊的愉快感情。我在那種愉快的情調裏和他談了些隨心想到的話。例如什麼中國近來純文藝刊物的日漸稀少啦，批評文學（我在日記本上寫批評文字）缺少啦，某某書局出的新書太濫啦，某人的○○一書簡直無聊已極啦等等的話。這都是信口雌黃，在會審公堂上可以拿去作吃官司

證據的胡言亂道，又不是彼此對初次見面的人可以信託說出來的話。我一頭說話一頭用一隻變了色的草帽作扇子，意思倒並非想把這些胡言亂道快點扇開似的。

周君似乎會意了，走了出去一回兒進來給我一把扇子。不久又進來了三四位也是年青的同志。他們照例也是環立着和我談話。我用隨便的態度請他們就坐。和他們一起再談了些既無中文又非敷衍的話。我忽然想起似的向周君道：

“有一位常在創造上作畫的是那一位”？

周君就指着眼面前站着的一位青年道“就是這位葉靈鳳君”，我看身穿粗黃夏布短衫褲，戴玳瑁金腳眼鏡及一隻黑紗壓髮帽的就是這個精雅的畫家葉靈鳳君。不知怎的我平素喜歡的詩人畫家不是已成名的有了傑作與手紀的，乃是未成名的年青的。因為後者的想像色彩等都有不能限量的富麗，我單能與那些詩人畫家們接觸，連我自己的生活也從枯寂而變為富麗，眼前的葉君也罷周君也罷

以及其餘的各位也罷都是年青而有年青人特有的略帶羞縮的神情。成了家的文人畫家已慣於世俗，習知了成功者的祕訣，極難有初創時代的藝術真率性。我看葉君又自有別致的一個畫家樣的少年——說青年還不及說少年可以傳神那個畫家的羞澀。

周君送我一本新出的創造，說上面有我的一篇舊稿已經登出了，我聽了驟然間覺得一陣羞慚的心流。他又把新出的洪水也送了我一期，又送了我兩冊新成書形的小說集。天氣熱極，我也渴極。我把倒在眼面前的冰汽水喝了兩杯，周君又給我倒滿一杯。我又要喝的時候，忽然對他們說道：

“你們也一起喝點罷。”其實那一瓶已快給我一個人喝完。他們說：

“還是客人喝罷，我們不要緊的。”

我照例是要想心無半點客氣而一不在意又去情性的表示了客氣。一直是那種混沌的心境同他們幾位年青的文人畫家談了些時的話，然後拜別出來。

走到樓梯跟前，看見那邊亭子間的門是打開的，直可以看到後面隨風飄動的窗幃。看到亭子間裏並排的兩對面鋪着好幾張床。知道是這些年青的文人畫家們的寢室了。像這樣年青人的共同生活時代在我好像已經過去，再也難於追捉回來的一個愉快安樂的時代。

“這時候天氣正熱，何不就此地一同吃了午飯等稍微陰涼點再走。”

這是周君說得極自然想要留我中飯的語氣，我像覺悟到與那個愉快安樂的共同生活時代早已告了別似的，稍稍覺得肚餓與畏懼日中的炎熱，自己振作着從△字十一號出來走在火威熾烈的關北街道上。

看到遠遠地有輛空車，我就大聲喊住了，走過去也不講價錢坐上了。在一頭搖擺之中想道方才我忘記對他們談的還有一句話：

“凡是一切事業，只在還沒有成爲職業的時代爲止是有意義而有興趣的。”我想這樣子鼓勵他們

爲創造社努力

一九二六，十，五北京。

第一次訪問創造社大約是七月底的事，對於那次訪問得到了既如上述的好印像，何以沒有第二次的訪問呢？實在那一次上海生活的匆忙是說也不信的。八月十一日一半像從匆忙，炎熱，疫癘中逃生樣的在清晨的準七點我從北火車站離開了上海。在下關休息了一天，在十三那天正從下關到浦口的渡江輪上買了一份時事新報，偶爾就在封面上看到創造社登的一個標題極大的啓事，知道創造社被檢查，社員們被拘後已即釋放，幾天清理故仍可繼續營業等的話，心中有非常關心的憤慨。想到那些活潑的“小夥計”們一個個捉到橫暴無情的牢獄去，真是何苦來呢。走進了津浦車箱裏後從衣袋裏摸出一本手記簿來，翻到訪問創造社那天臨走時好像衙門裏去的人似的請裏面一位青年把我今天在創造社見到的幾位的大名開了下來。此

刻就在手記簿上了。一頭讀他們的名字，一頭想像他們的面容，一頭氣悶着被檢那時的情形。

八月中旬到了北京寫了一信給全平君，不久接到洪水，以此略知當時的情形。又看到登着的預告，阿呀，那些“小夥計”們什麼獄中記啦，獄外記啦忙得不得開交。我也正在張開嘴吧聽得出神的時候，轟然一個霹靂！阿呀呀，真是危險極了，我在北京九月初頭上的一天，好好地學校裏也幾幾乎做了獄中人，或者再厲害一點是身首異處。爲怕說到題外去，不及私事了。總之我們的環境是一瞬間接着瞬間變進黑暗裏去，或是燒進烈火裏去。看罷，看我們站在同一防線上的青年的掙掙力，抵耐力，戰鬥力有多少罷。勝利是可以預期的，不過……。

下面想單對周全平君說幾句話，順便接寫下去了。

全平！記得訪問創造社的那天從樓上大家走下來站在樓下書籍陳列櫃前面我們兩人間有一段

會話，那時適巧從外面走進來一個人報告接到廣東的消息說沫若等一些人都已從軍去了，於是你說以後創造洪水以及單行本的稿件都快告缺乏。

“目下的情形，因為還不是我們出去說話的時候。”這是你說的。我因為匆匆想走了，沒有靜心聽懂你那句話，於是就隨便接話道：

“我們不是站在同一道前線上麼，又何必生退却之心。”於是你就申說好像你是尙在修磨時期只好作我們的後盾，不願走上前線來云云的意思。我自己本也不認已站到了前線作指揮是不待說，就是短兵相接的兵士都不配稱。我說上一句話時爲要拉住你一道之故，後來你說明之後我只像鑽到你給我的信上不許稱你“先生”一樣，視爲無足輕重。

現在我要向你舊話重提了。你說：“目下的情形還不是我們出去說話的時候。”我當時沒有真正聽懂就回答道：“我們不是站在同一道前線上麼。又何必生退却之心。”如今我把那兩句話都肯定了

作根底，再在上面加添我要說的話罷。我並非對你客氣，我自認還沒有到我出去說話的時候。我非但不是前線的指揮，又想務必偷懶點一直退伏在補充隊裏做個小卒。我也並不想退却，而我站的線，認為還只在三四道以內的防線上。假如你也同意，那末你我就說還是站在同一道防線上。我以同一防線上的一個小卒的資格向創造社的小夥計說話。我說我們務必要蓄養實力。我說我們在開火以先務請要認清敵人是不待說，連方向都要認清。同一軍陣裏有時也許要發見敵人，而在敵人裏面有時說不定也混着同一友軍的親人。不過黑夜裏小有誤會認不清楚了，彼方來了一排槍，我方還敬了一排槍。但是不久天會亮的，終會認清楚的。稍微靜待罷，莫要耗費精力罷。單就我一個人小卒的經驗上曾有過那種同類的事情，此刻還是相峙着呢。而且確實認為友軍中的親人忽而出於對敵行動的攻擊來。我們只好嚴陣以待其變。尼采怎麼告我們的？

“愛我們的敵人！”

“把生命過活在忍從裏與戰鬪裏！”

“有那一個武士願得人家饒恕！”

“我不饒恕你，我衷心愛你！”

十月五日夜後記誌





(附)創造社各作家略傳

郭沫若小傳

四川嘉定府人，現年四十歲。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在帝大時即對於文學有非常熱烈的嗜好。如“女神”等，都為當時之力作。自帝大畢業後，完全投身于文藝運動，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日”，“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開闢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後創造社成立出版部，出版震動全國思想界的“創造月刊，”氏之力量最大。這是郭氏的前期的思

想與行動，在思想上，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在行動上，完全是一個浪漫主義文藝運動；那時的創作如“女神”，“星空”，“落葉”，“瓶”等，翻譯如介紹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都可見到氏之前期思想的表徵。一九二六年，氏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革命與文學”後，即打破了他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主張，而氏之提倡革命文學，亦在此時開始。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氏即投身於革命的實際運動，革命軍抵定武漢，氏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國軍克復南京，國共分裂，氏復捨去政治運動，度其文藝生活。現留居日本，除努力介紹美國辛克萊氏的著作以外，復埋頭於中國甲骨文之研究。曾任上海大夏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等文學教授。

著作甚多，詩歌方面有“女神”（短詩），“星空”（短詩）“瓶”，（長詩）“前茅”，（短詩）“恢復”，（長詩），辛夷集等。（現完全收集在“沫若詩集”內）

小說方面及戲曲方面，現完全收集在“沫若小說戲曲集”內。計分十輯，第一輯“塔”，包含短篇

小說七篇，第二輯“落葉”，包含長篇小說一篇，第三輯“漂流三部曲”，包含短篇小說三篇，第四輯“行路難”，包含小說一篇，第五輯“山中雜記”，包含隨筆數則，第六輯“路畔的薔薇”，包含短篇六則，第七輯“牧羊哀話”，包含雜記四篇，第八輯“後悔”，包含雜記七篇，第九輯“女神”，包含戲曲四篇，第十輯“三個叛逆的女性”，包含劇作三篇。

自敘傳方面，有“幼年時代”，“劃時代的轉變”“黑貓”“創造十年”等。

論述方面，有“文藝論集”，“文藝論集續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研究”，“西洋美術史提要”等。

翻譯方面，有“浮士德”（德國歌德的詩劇），“少年維特之煩惱”（德國歌德抒情長篇小說），“德國詩選”（與成仿吾合譯），“新時代”（俄國屠格涅夫長篇小說），“卷耳集”（詩經）“沫若譯詩集”，“雪萊詩選”，“茵夢湖”（德國施篤謨散

文詩)“新俄詩選”(與L.合譯)，“查拉圖司屈拉鈔”(尼采)“美術考古學發現史”，“銀匣”，“爭鬥”，“法網”，“異端”，“約翰沁孤戲曲集”，更有以易坎人的筆名翻譯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煤油”等三部鉅作。

郁達夫小傳

浙江富陽縣人，現年三十六歲，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他的文藝生活的開始，在他肄業杭州第一中學的時候，已有很密切的關係了。那時所讀的東西，大都是“花月痕”，“桃花扇”一類的東西。一九一一年去日本，翌年，當他十八歲的時候，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在這一年中，是郁氏與西洋文學接觸的起始，先研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復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該校四年，所讀西洋文學作品，有一千餘部。

入帝大後，對於文學的嗜好，更加熱烈，在一

九二一年，創作了一部震動全國青年的“沈淪”，這部作品完全是描寫病態的青年的 Sentimental 之性的苦悶，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炸彈，作者的大胆無畏，頗為當時青年所熱愛，為描寫“情慾的憂鬱”之一部典型作品。

一九二二年從日本回國，這時郁氏正式開始文藝生活了。那時候創造社已在中國抬起頭來，郁氏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都是該社中堅，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亦相繼出版。一九二三年，“蕪湖集”出版，其後又絡繹寫了不少的小說和散文，而其作品的中心，完全是描寫青年的病態的心理和頹廢的行動，而這許多小說，大都是郁氏的生活的實感，或描寫的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能博得廣大青年的同情與熱愛。

一九二三年九月，受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文學教授，這中間又作成了“秋柳”，“零餘者”，“十一月初三”等幾篇短篇小說。一九二五年在武昌大學任教，這一年郁氏的生活最為苦悶，文章一筐也沒

有做，病了半年，到廣州，任廣大教授，一九二六年回上海。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郁氏將自己的日記出版，名“日記九種”，在這裏面記載着他和王映霞的戀愛歷史，從新把他從頹廢中救拔了出來。他在“鷄肋集”的題辭上寫着：“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這大約就是指的王映霞了。

郁氏創作的特色，都是反映青年的病態一方面的，青年的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他都如實地描寫出來。在郁氏的作品中，都是灰色的頹廢的人物，這是他的創作的特色。

他曾主編過“創造月刊”，“洪水”，“大眾文藝”等雜誌。

前年他又到安徽大學去擔任過教授，但不久就回來了。現居上海，從事於創作翻譯。

郁氏的作品，關於他的短篇小說，小品及論文等，完全收在“遠夫全集”內。全集已出六集：第一

集包含短篇小說十一篇，第二集包含短篇小說八篇，第三集包含短篇小說及小品文字等十八篇，第四集包含文藝論文小品文及譯文等數十篇，第五集包含藝術雜論及批評介紹等數十篇，第六集包含短篇小說五篇。除此之外，長篇小說有“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及“日記九種”。論文方面有“小說論”，“文學概說”，“戲劇論”等；翻譯方面有“拜金藝術”（辛克萊），“小家之伍”（歐美小說選譯）等。

張資平小傳

廣東梅縣人，現年三十五歲 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初學礦學地質學，後從事于文學。

張氏為創造社社員，創造社在上海成立出版部時，氏為中堅份子之一，任該社理事。

張氏著作極多，其創作的特色完全取材于青年的戀愛問題，加以大胆的描寫，文筆通俗流暢，故大受一般青年所歡迎。

初期的創作如“沖積期化石”，“愛之焦點”等出版後，一般青年尙對之平平，自長篇小說“飛絮”出版後，方得到許多青年的熱烈歡迎，稱爲現代戀愛小說的典型作家。

著譯如下：

長篇小說有“沖積期化石”，“飛絮”，“最後的幸福”，“苔莉”，“青春”，“柘榴花”，“歡喜陀與馬桶”，“糜爛”，“長途”，“愛力圈外”，“愛之渦流”，“跳躍着的人們”，“天孫之女”，“紅霧”，“明珠與黑炭”，“上帝的兒女們”，“羣星亂飛”等。

短篇小說有“梅嶺之春”，“愛之焦點”，“植樹節”，“素描種種”，“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等。

翻譯方面有：“文藝新論”（日本藤森成吉），“草叢中”（日本小說），“平地風波”，（日本小說），“某女人的犯罪”（日本小說），“襯衣”（日本小說），“文化社會學”（日本關榮吉），“社會學成立史”（日本加田哲二）等。

論文及編輯方面有“歐洲文藝史綱”，“普通地

質學”，“地質學者達爾文”，“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人類進化論”等。

現居上海，任大夏大學文學教授，仍努力於創作翻譯。

成 仿 吾 小 傳

湖南新化人，當代中國文藝批評家。

成氏留學日本學習化學，回國後與郭沫若，郁達夫，王獨清等致力於創造社之文學運動，先後在創造月刊，洪水等發表論文及評論，重要者有“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文字。

創造社被封後，成氏走歐洲，遍歷英，德，法，諸國，近已回國。

著作有“流浪”（小說散文集）“使命”（評論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書。

王 獨 清 小 傳

陝西長安人，現年三十四歲。前留學法國，專

研藝術，回國後，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等發起創造社，為五四運動以來唯一有力之文學團體，震動整個的中國文壇。一九二五——二六年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文科學長，創造社理事并主編創造月刊。創造社被封，任上海藝術大學教務長，主編展開月刊，是時在思想方面已與郭郁張成等分途而馳了。

王獨清的詩豪放而富熱情，其前期詩作，頹廢哀傷的氣分極為濃厚，“哀弔羅馬”，“聖母像前”，“哀希臘”等，並注重于旋律與格調，故其詩可琅琅上口，

其著作有：“聖母像前”，“死前”，“威尼市”，“埃及人”，“11 Dec”。（以上均詩集）；“楊貴妃之死”，“貂蟬”（以上為劇本）；“前後”（書信散文），“獨清譯詩集”，“暗雲”（短篇小說集）；“我在歐洲的生活”（長篇小說），“中國文化運動史”（著作中）。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

71600



舊